

大屯國立公園的成立、運作與轉變 (1934-1945)

張家綸

摘要

受到日本明治以來強調山岳的「雄壯」、「高大」之風景論述的影響，當臺灣總督府開始遴選國立公園之際，相較於擁有大風景且較受青睞的阿里山、太魯閣，具圓錐的山容，並呈現女性形象的大屯山群，其風景被專家評價為「貧弱」。然在臺灣總督府的強力主導以及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的協助下，1937年大屯國立公園正式成立。此時臺灣已進入戰時體制，內務局重申國立公園的兩大使命為「提升國民體能」和「振興國民精神」。在此背景下，原本以觀光為主要目的的大屯國立公園也開始具有訓練人民身心的功能。不過，隨著1941年起戰爭局勢緊張，日本漸將國立公園轉變成全然訓練人民身心的「健民地」。大屯國立公園也有相同趨勢，其觀光功能不僅逐漸消失，且境內在臺北島都計畫的推動以及新體制健行的出現下，興起一陣登山熱潮。到了1943年，日本的健民地概念同步實施於臺灣。臺灣的國立公園被規劃成日本國土計畫中的厚生綠地。因應國土計畫，臺灣總督府將大屯國立公園規劃成臺北的綠地。然隨著大屯國立公園到戰爭末期成為軍事要地後，厚生綠地計畫已漸無實現的可能。

關鍵詞：大屯國立公園、大屯國立公園協會、觀光、親近性、健民地

The Establishment, 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Datun National Park, 1934-1945

Jia-lun Chang*

Abstract

Influenced by Japan's Meiji-era discourse on landscapes, which emphasized the majestic and grandiose qualities of mountains,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of Taiwan faced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when designating the Datun Mountain Range as a national park. Compared with the more favorably regarded Alishan and Taroko, which feature spectacular and striking landscapes, the Datun Mountain Range was deemed "weak" by experts because of its conical peaks and association with feminine imagery. Nevertheless, the Datun National Park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1937 under the strong-handed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or-General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Datun National Park Association. At this time, Taiwan had already entered a wartime regime, and the Bureau of Internal Affairs reaffirmed tha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missions of national parks were to "enhance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and "foster a robust national spirit," respectivel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Datun National Park,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tourism, also came to serve the purpos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training of the populace. However, starting in 1941, the intensifying war effort prompted Japan to gradually transform its national parks into "citizen training grounds" dedicated entirely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ing of its people. A similar trend emerged in the operation of Datun National Park. Its tourist functions had gradually diminished, and a renewed enthusiasm for mountaineering emerg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aipei as Island Capital" Plan and to new institutional hiking initiatives within the park. B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943, Japan had extended the concept of “citizen training grounds” to Taiwan, and Taiwanese national park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Japan’s national land planning framework as “welfare green spaces.” In response to this national land plan,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of Taiwan designated the Datun National Park as a “welfare green space” for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However, as the war drew to a close and the park increasingly became a strategic military zone, implementation of even the “welfare green space” plan was unfeasible.

Keywords: Datun National Park, Datun National Park Association, Tourism, Accessibility, Citizen Training Grounds

大屯國立公園的成立、運作與轉變 (1934-1945)*

張家綸**

壹、前言

1937（昭和12）年，日本政府指定在臺灣成立3座國立公園，分別是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和大屯國立公園。根據當時日本人的調查結果，新高阿里山的面積有185,980公頃，次高太魯閣面積有272,590公頃，兩座國立公園的最高山脈均達3,000公尺以上。至於大屯國立公園的面積僅有8,265公頃，海拔高度為110公尺到650公尺。¹顯然，大屯國立公園無論是面積或是高度都不及另外兩座，正因如此，大屯國立公園在籌設之初即備受爭議。批評者普遍認為，相較於具有雄偉、高大山脈的新高阿里山和次高太魯閣，大屯山群風景較為「貧弱」。如此爭論一方面點出大屯國立公園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帶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何外型「雄壯」、「高大」的山脈較受青睞？第二：為何原本被認為不可以成為國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風景、國家與地方社會：近代陽明山形象的建構與轉變（1936-1962）」（編號：112-2410-H-034-038-MY3）成果之一。初稿曾發表於2024年11月「第七屆『白沙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土地申告書時空檢索系統』成果與應用」。感謝審查人及洪廣冀、許佩賢、蔡龍保、莊世滋、徐聖凱等師友給予諸多寶貴意見，也特別感謝李偉呈、朱紫榕兩位助理的諸多協助。

收稿日期：2025年1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4月16日。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

¹ 山口一重，〈雄大なる三公園—その紹介と順路〉，《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12月27日，版6。

立公園的大屯山群，最後又被日本政府指定？

針對第一個問題，目前學界主要從文化角度切入。根據帆苧猛的研究，明治初期地理學家志賀重昂在其《日本風景論》中所展現的，並非靜態的自然之美，而是一種象徵著日本風土生命力、發展力和活力的動態之美。其中，「劇烈盛大」、象徵天地間的「大」的火山即是造成日本生物、氣候多樣，使「日本江山洵美」的主因。如此環境所塑造出來的活力和發展力，即是日本的國民性；² 荒山正彥認為《日本風景論》強調山岳的「雄壯」、「高大」，影響了近代日本的風景論述；³ 蔡家丘指出，1930年代接受政府委託繪製山景畫的畫家們，多以日本山岳風景的特徵為中心，著重於表現出臺灣新高山「獨立而崇高的氣勢」，或是凸顯「日出」之景來暗喻臺灣高山為日本內地之延長，進而讓殖民地人民透過認同國土，以凝聚國民意識。⁴ 1920年代起，輿論開始討論臺灣是否該設立國立公園，「雄壯」、「高大」之「大風景」特徵即成為日本選定國立公園的標準之一。根據標準，大風景地涵蓋3種：「代表同一型式風景且相當傑出」、「自然風景地且區域廣大」、「地形地貌雄大或風景富有變化」。⁵ 西田正憲就從日本設立國立公園的標準切入，扣緊「雄壯」、「高大」兩項關鍵字，說明臺灣新高阿里山和次高太魯閣雀屏中選的原因。⁶ 神田孝志指出，臺灣之所以以日本國立公園為標準選擇山岳的地形，主因有二：一是作為國家風景的山岳地形才能喚起日本的國民性；二是臺灣地處亞熱帶，容易讓日本人的身心受到影響而逐漸「臺灣化」，故有必要選擇山岳地形。⁷ 簡言之，持文化角度的研究者，傾向於認為設

² 帆苧猛，〈近代風景觀の成立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志賀重昂の「日本風景論」を中心として〉，《関東学院大学人間環境研究所所報》，第4期（2006年3月），頁20-30。

³ 荒山正彥，〈明治期における風景の受容——「日本風景論」と山岳会〉，《人文地理》，第41卷第6期（1989年12月），頁63-76。

⁴ 蔡家丘，〈江山洵美是吾鄉——丸山晚霞與東亞山岳圖像的意涵〉，《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7期（2014年9月），頁80、82-83。

⁵ 該方針為1931年9月29日制定，曾在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第一次開會時討論，後來也成為選定臺灣國立公園的標準。詳情可見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出版地不詳：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1936年），頁14-16。

⁶ 西田正憲，〈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臺灣の国立公園〉，《地域創造学研究：奈良県立大学研究季報》，第22卷第2期（2012年1月），頁97-136。

⁷ 神田孝治，〈日本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国立公園の風景地選定と心象地理〉，《歴史地理

立國立公園是日本政府塑造國家認同的一種方式。然而，這樣的研究取徑仍然無法解釋為何風景「貧弱」的大屯山群會被指定為國立公園。因此，若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則必須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經濟。

丸山宏、田中正大、村串仁三郎等3位日本學者均曾指出，1920-193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不景氣，因此日本政府盼利用正在發展中的旅遊業，能以日本當地的風景為媒介，吸引外國觀光客前來，進而賺取外匯與振興地方經濟。日本國立公園便是在此背景下誕生。⁸ 關於臺灣方面的研究，曾山毅、唐伯良和徐聖凱等人分別從觀光、經濟和休閒的角度探究臺灣國立公園的誕生背景；⁹ 林玫君、蔡龍保和蔡佩蓉則分別從登山、鐵路和觀光等角度切入，指出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的設立如何有助於地方經濟之振興；¹⁰ 蔡惠頻、許佩賢及其團隊從休閒和地方開發的角度指出，自1910年代起，日本政府即多次擬定延續性的計畫，有意將大屯山一帶打造成兼具健康與養生特色的休閒勝地。¹¹ 這類從經濟角度切入的研究，能更清楚說明大屯國立公園成立的歷史背景，也揭示了其並非偶然誕生，而是官方休閒娛樂政策下的產物。其中，許佩賢特別指出，在國立公園成立的過程中，臺

學》，第53卷第3期（2011年6月），頁1-26；神田孝治，〈日本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大屯国立公園の指定と地域〉，收入陳俊強、洪健榮主編，《臺北州建州百年：在地化與國際化的視角》（新北：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2021年），頁47-72。

⁸ 丸山宏，《近代日本公園史の研究》（東京：思文閣，1995年），頁295；田中正大，《日本の自然公園：自然保護と風景保護》（東京：相模書房，1981年），頁134-189、233-238；村串仁三郎，《国立公園史の成立：開發と自然保護の確執を中心に》（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5年），頁47-69。

⁹ 曾山毅，《植民地臺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年），頁233；唐伯良，〈日治時期臺灣國立公園的設置與角色賦與〉（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徐聖凱，〈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

¹⁰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頁431-432；蔡龍保，〈由森林鐵路到觀光鐵路：日治時期阿里山鐵路經營策略之轉變（1896-1945）〉，《地理學報》，第105期（2023年8月），頁103-137；蔡佩蓉，〈從帝國森林到帝國風景：阿里山的空間生產與文化想像（1896-1937）〉（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3年）。

¹¹ 蔡惠頻，〈從「草山」到「陽明山」：一個地景文化意涵的演變歷程〉，《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第8期（2009年10月），頁127-152；許佩賢主持，《109-110年陽明公園及其周邊日治時期人文歷史調查委託辦理案》（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21年）。

灣總督府的主導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換言之，在經濟動因與政治力量的共同推動下，使大屯山群得以成功晉升為國立公園。¹²

綜合上述，前人的研究已清楚建立了日治時期臺灣國立公園的前史，但與此相比，國立公園成立後的發展卻較少受到關注，尤其是在1941年以後更為稀少。其原因在於，1941年3月28日，日本中央政府對國立公園委員會的官制進行調整，並廢止了《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官制》。¹³ 然日本學者西村貴裕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開始強調國立公園如何培養國民性及其如何有助於國民的身心保健。1938年，國立公園的主管機關改為厚生省體力局後，更強調振興國民精神和提升國民體力。到了1940年代，國立公園已逐漸轉變成訓練國民身心的「健民地」。至此，國立公園可以說是已經「軍事化」了。¹⁴

如果說1930年代日本國立公園的意義已經開始轉變，那麼臺灣的國立公園在戰爭時期是否也具備相同的使命？在1940年代，是否如同日本一樣也轉變成「健民地」？目前已有不少研究點出這個現象。例如，林玫君曾指出，1937年後，臺灣的國立公園已轉變成民眾平時備戰之處所，其中登山活動也從休閒活動轉變為訓練人民體能和心智的活動。¹⁵ 徐聖凱亦指出，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後，娛樂管理方針從矯正「不健全」娛樂，漸轉向提振民心士氣。國立公園內有許多活動

¹² 丸山宏和西田正憲皆指出國立公園成立背後的政治因素。以自然條件而言，位於日本長崎縣的雲仙山，其條件與大屯山群相近，雖未被賦予「國立」的地位，而是具有「鄉土」價值的風景地，然而在日本第二次國立公園委員會上，部分委員仍認為雲仙擁有多項優勢，包括使半島景觀更為豐富多樣的火山群、細緻優美的植物景觀、良好的眺望視野、豐富多彩的利用價值，以及吸引外國觀光客的特點等，故而最終被選定為國立公園。西田正憲編著，《国立公園と風景の政治学》（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21年），頁278-279；丸山宏，《近代日本公園史の研究》，頁290。

¹³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官制廢止」（1941年4月6日），〈昭和16年4月臺灣總督府報第4157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1034157a007。

¹⁴ 西村貴裕，〈The “Militariza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Japan (1925-1944)〉，《大阪教育大学紀要 第II部門 社会科学・生活科学》，第65卷第1期（2016年9月），頁11-22；西村貴裕，〈「国立公園」から「国土と健民」へ——国立公園の意義をめぐる言説の変遷（1929～1944）〉，《大阪教育大学紀要 第II部門 社会科学・生活科学》，第60卷第2期（2012年2月），頁1-18。

¹⁵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頁438-439。

不以觀光為名，而是以登山、健步、強身等名義來舉辦。¹⁶ 在此背景下，相較於其他兩座國立公園，大屯國立公園在此過程中又具有什麼特色和意義？

於此，本文將從兩個部分著手，首先是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的成立與運作。考察成立於1934年的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其目的在宣傳公園，並推動相關建設。過往雖有相關研究提到該協會，但仍欠缺較為整體性的研究。本文將從其成立背景、成立目的、組織人事、業務內容，探究協會如何有助於國立公園的運作。其次，本文以登山活動為中心，重新探討1937年後大屯國立公園內的活動，尤其著重於1941年後國立公園的功能轉變。

綜合上述，本文將從休閒娛樂角度切入，重建大屯國立公園的發展史。在論述安排上：首先，說明大屯山群如何以「貧弱」之姿出線，成為國立公園的候補地；接著，以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為中心，闡明協會如何利用宣傳，讓大屯國立公園候補地擺脫風景「貧弱」之說；然後，說明大屯國立公園成立後，內務局與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如何因應戰時體制，改變成立目的和宣傳方式。最後，揭明大屯國立公園如何從觀光地逐漸轉變成訓練人民身心的場域。

貳、大屯山應該是什麼樣的公園？

一、大屯山紀念公園計畫

1912年，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和臺北廳長井村大吉前往草山¹⁷視察時，發現此地溫泉的泉質不若北投溫泉有刺激性，適合長期療養。因此他們認為，若能開發草山溫泉這片與北投溫泉區商業化氣氛有別的清靜區域，必將受到大眾的歡

¹⁶ 徐聖凱，〈日治後期臺灣的娛樂管制、社會調節與民眾應對〉，《新史學》，第32卷第3期（2021年9月），頁151-154。

¹⁷ 此處草山地域範圍泛指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所圍繞的山谷地區。詳情見黃雯娟，《陽明山地區地名探源與調查報告》（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年），頁5。

迎。¹⁸ 另一方面，殖產局的礦物課技師出口雄三也在該年出版《大屯火山彙地質調查報文》一書，介紹北投、金包里和草山等地的溫泉。¹⁹ 經過了幾次的調查，臺灣總督府開始有開發草山的構想。

進入1920年代後，臺北不僅工商發達，人口也在1920年12月達到164,329人，居全臺之首，其中日本人達45,675人，同樣居全臺之冠。²⁰ 隨著人口增長，臺北廳長梅谷光貞試圖將大屯、七星、草山、竹子湖、金包里、基隆一帶，打造為一片「內可迎接市民，外可吸引遊客」的理想遊樂天地。²¹ 因此，1920年8月21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在臺北廳長梅谷光貞盛邀下，前往草山溫泉旅遊。他在保養所洗浴後，不禁發出讚嘆：「一浴快然，洗盡熱塵而快不可言。幽溪深樹，月光水聲，真是天外之仙境也」。²² 隔日，田總督繼續視察草山一帶，當他看到溫泉後，再次讚嘆：「蓋溫泉源之豐富，除別府溫泉地之外，未知有其比也。」他更表示，此地「土地高燥，氣象清涼，山景秀雅，境地開闊，修築而為一大遊園，可不失臺灣一大勝區也」。²³ 在田總督視察期間，陪同的梅谷光貞趁機提出了「大公園經營之計畫」。²⁴ 此計畫提出後，加上1923年裕仁皇太子行啟臺灣，進一步促使臺北州政府在當地興築許多基礎建設，帶動了該地的土地開發及交通事

¹⁸ 〈草山溫泉成行〉，《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30日，版7。

¹⁹ 詳情見出口雄三編纂，《大屯火山彙地質調查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2年）。

²⁰ 〈大正九年臺灣現住人口統計概說〉，收入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大正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2年），無頁碼。

²¹ 〈草山竹仔湖を初めとし七星山下の風景を抱擁する 一大遊園地の新設第一期計畫は三百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8月24日，版7。

²² 田健治郎，《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8月21日），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24/12/16點閱）。

²³ 田健治郎，《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8月22日），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24/12/16點閱）。

²⁴ 田健治郎，《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8月21日），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24/12/16點閱）。

業等發展。²⁵

1923年東宮行啟後，原本臺北州預定以行啟紀念事業為訴求，提出興建大型遊樂園計畫，惟因經費過高，遭臺灣總督府否決。至1928年11月，臺北州政府以裕仁登基為契機，特委託林學家本多靜六提出涵蓋草山、北投、淡水、大屯等地之大型公園計畫。關於此計畫，州政府希望不同於北投那般主要以飲酒或性風俗產業作為宣傳的溫泉觀光地，而是希望將此地開發成以健康、養生為特色的休閒勝地。²⁶ 然而，1929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受到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衝擊，開始緊縮財政，草山公園計畫因而被迫縮小。最後，只完成新公共浴場的建設以及部分的道路改修工程。²⁷ 此一大規模遊樂園興建計畫雖因經濟因素未能完全實現，但政府在草山建設休閒設施的想法並未因此消失，反而在後來的國立公園計畫中獲得了實現。

二、國立公園的討論

當臺北州政府選定大屯山群為基地籌建大型遊樂園時，日本當局也正積極規劃設立國立公園，這股風潮隨之影響到臺灣。同時，《臺灣日日新報》舉辦了臺灣八景票選活動，進一步引發了民眾對臺灣自然風景的關注。²⁸ 在此背景下，論者以為在臺灣設立國立公園的時機已然成熟。以北部地區而言，大屯山群至草

²⁵ 詳見許佩賢主持，《109-110年陽明公園及其周邊日治時期人文歷史調查委託辦理案》，頁300-306。

²⁶ 許佩賢主持，《109-110年陽明公園及其周邊日治時期人文歷史調查委託辦理案》，頁309；坂井洋，〈「泡」在臺灣——臺灣溫泉的發展與泡澡行為之變遷〉（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年），頁57-62。

²⁷ 〈愈愈草山に出来る モダンな公共浴場 ゴルフリンク其他を廢止又は縮少 消極化された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0月1日，版7。

²⁸ 1927年5月《臺灣日日新報》舉辦了八景十二勝票選活動，在該次活動中沒有入選八景的被稱為十二勝，其中就包含了草山和北投合併的一勝。詳情見吳兆宗，〈昭和2年臺灣八景募集活動及其影響〉（彰化：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曾山毅，〈臺灣八景と植民地臺灣の観光〉，《立教大學觀光學部紀要》，第5期（2003年3月），頁65-74。

山、北投一帶的溫泉區域，最適合作為國立公園的選址。²⁹ 經媒體報導後，大屯山紀念公園計畫中的新公共浴場「草山眾樂園」於1930年11月21日正式落成。為因應樂園的落成，公車班次隨之增開，吸引大量觀光人潮湧入。至1934年，草山眾樂園的入場人數已超越北投公共浴場（草山：56,958人，北投：46,031人）。³⁰ 草山人潮湧現，或許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1933年6月，在國立公園調查會的會議上，財政局長岡田信表示，比起吸引外國觀光客，更應設法撫慰那些難以忍受臺灣亞熱帶氣候、懷念日本內地風土的母國人，並提供便利且價格低廉的休閒設施。基於此考量，鄰近島都的大屯山群遂成為相當合適的選址。³¹

此後，報章雜誌上開始出現許多有關大屯國立公園的報導。1934年10月，正之介在〈大屯山彙國立公園問題〉一文中表示：「如彗星般出現的大屯山群」，雖然不及「規模粗獷如男性般雄渾」的新高阿里山和次高太魯閣，卻是「每一處景致皆以纖細手法自然切割，即便細細描繪亦無絲毫遺漏，毫無多餘與浪費，形成一氣呵成、渾然天成的大風景，令人感到痛快」，他並認為，「就天然技巧而言，大屯山展現出的是女性般的風景」。³² 有別於阿里山、太魯閣等山脈所展現的雄壯高大、帶有男性色彩的風貌，正之介借用女性的視角，詮釋大屯山群的特色。《臺灣日日新報》也指出，大屯山群不僅擁有全臺唯一的火山地形，並且與以沉積岩景觀為主的其他兩座國立公園截然不同，展現了獨特的火成岩風貌，加上鄰近島都、交通便利等條件，使其成為本島國立公園的首選之地。³³ 此外，岡田信也經常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呼籲：為了促進熱帶都市居民的健康，應在這片「上天恩賜的綠洲」設置休閒娛樂設施。³⁴

²⁹ 〈臺灣と國立公園の設置 正に其の機運到來した〉，《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30日，版2。

³⁰ 臺北州，《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年度》（臺北：臺北州，1935年），頁60-61。

³¹ 正之介，〈大屯山彙國立公園問題〉，《熱帶園藝》，第4卷第10期（1934年10月），頁436。

³² 正之介，〈大屯山彙國立公園問題〉，《熱帶園藝》，第4卷第10期（1934年10月），頁434-435。

³³ 〈國立公園と大屯山彙地域 島都に近く利用價值最も大〉，《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26日，版2。

³⁴ 〈不連續線（其六） 臺北市民のオアシス 草山の利用 一般へ開放施設を望む〉，

相對於上述，反對者則認為大屯山群規模狹小、山勢光禿、景緻差，既缺乏南國氣息，也欠缺高山、溪谷等原始自然景緻。同時，林泉之美亦付之闕如，周圍環境俗化、墮落，無法讓有識之士願意居住。若將此地設為國立公園，無疑是褻瀆日本風景價值，從根本上破壞國立公園的立法精神。簡言之，與日本其他雄偉壯麗的國立公園相比，大屯山群的景觀顯得「貧弱」。³⁵ 至於當地民眾，多數如○生所言，對此抱持「事不關己」的態度，而汽車業者亦如沉睡的市民，「未感到任何痛癢」。³⁶

無論當時輿論如何，順應著當時草山的觀光熱潮，臺灣總督府和地方人士仍積極推動成立國立公園，目的在於延續先前的計畫，並持續充實草山的基礎建設。其中，知名茶商三好德三郎即是重要推動者之一。他回憶道：在岡田信表達出對大屯山群的興趣後，他便前往拜訪岡田。接著，又去拜訪臺北州知事野口敏治。當時，三好德三郎對野口敏治說道：「既然財務局長對此事如此熱心，那麼這個大好時機不應該浪費。您是否能立即著手推動草山、大屯山及其周邊地區設立國家公園的計畫呢？」野口當場表示同意。隨後，三人便在草山林間學校會面，敲定了推動大屯國立公園設立的相關事宜。³⁷

1934年9月15日，當內務局長小濱淨鑛將《國立公園法》施行於臺灣後的各類調查資料送往東京時，亦將大屯山群列為國立公園的候補地之一。³⁸ 隨後，10月，籌設大屯國立公園的預算已經編列，而岡田信為此專程前往東京。到達東京

《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27日，版5；〈大屯及草山一帶 國立公園計畫 以後將見機要求〉，《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8月7日，版8；〈大屯及草山一帶 國立公園計畫 以後將見機要求〉，《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8月7日，版8。

³⁵ 正之介，〈大屯山國立公園問題〉，《熱帶園藝》，第4卷第10期（1934年10月），頁436-437。

³⁶ ○生，〈國立公園の指定地たるべき大屯山一帶の交通路網〉，《臺灣自動車界》，第3卷第10期（1934年10月），頁2-3。

³⁷ 三好德三郎，〈大屯國立公園の誕生〉，收入謝國興、鍾淑敏、龍谷直人編，陳進盛等譯，《茶苦來山人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灣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頁436。

³⁸ 〈臺灣國立公園開設 決定明年度實現 經計上調查經費三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15日，夕刊版4。

後，他很快地與內務局長小濱達成共識，並認為若要讓該筆預算快速通過，必須盡快進行實地調查，以說服國會議員。那麼，應調查哪些地方呢？根據《大屯火山彙地質調查報文》，大屯山群包括大屯山、七星山、竹子山、小觀音山、面天山、磺嘴山、大尖後山、菜公坑山、觀音山、紗帽山與丁火巧山等11座火山。³⁹調查人員開始對這些山脈及其周邊地區進行勘查，以確定哪些區域適合劃入國立公園。10月19日和20日，內務局土木課長木原圓次、臺北州技師大橋準一郎等人首先對大屯山和面天山一帶進行調查。⁴⁰接著，10月29日和30日，木原圓次、技手桑名次郎、大橋準一郎、技手財津源吉等人，繼續前往七星山、小觀音山、竹子湖、菜公坑、大嶺嵴、五指山等地進行勘查。⁴¹11月2日，其中一位踏查者將其心得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根據他的實際體驗，他總結大屯山群的幾項特色：讓人感到既懷念又親切的火山景觀，加上天氣變化而呈現出複雜多樣的林相，既能眺望臺北盆地的美麗風景，又擁有便於大眾遊憩的優越地理位置。⁴²

不久後，日本政府決議通過小濱淨鑛等人提出的議案。1935年9月20日，政府頒布了改正《行政諸法臺灣施行令》，將《國立公園法》納入施行於臺灣的法律體系，並隨後公布《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官制》⁴³，預定於10月20日正式實施。緊接著，1936年2月3日，臺灣總督府召開了第一次國立公園委員會，討論評估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和大屯山群是否適合作為國立公園的候補地，並研究候補地的範圍。其中，臺灣總督府預定大屯國立公園的候補地面積為9,350公頃，境內包括七星山、面天山、小觀音山、竹子山等約十座火山，以及北海岸一

³⁹ 出口雄三編纂，《大屯火山彙地質調查報文》，頁1-2。

⁴⁰ 〈國立公園への第一步 草山から金山への自動車道路 來年度に於いて開鑿する計畫 昨日も係員が踏査〉，《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1日，版7。

⁴¹ 〈大屯山彙を 視察して下山 木原土木課長一行〉，《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31日，版7。

⁴² 〈踏査記（2） 雄大な景觀に 價值を再認識 國立公園候補地大屯山彙〉，《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3日，夕刊版2；〈踏査記（4） 千尺の火口壁 山中の一偉觀 國立公園候補地大屯山彙〉，《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7日，夕刊版2。

⁴³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官制」（1935年10月2日），〈昭和10年10月臺灣總督府報第2507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典藏號：0071032507a002。

帶。⁴⁴ 然而，在這場會議上，仍然有人對大屯國立公園候補地的資格提出質疑。

《臺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坦言，相較於新高阿里山與次高太魯閣，大屯山群的風景要素顯得較為「貧弱」。出現此一評論，是因為當時成為國立公園的必要條件中，其他兩個候補地符合了「代表同一類型且相當傑出的風景」、「自然風景地域廣大」、「地形地貌雄偉或風景富有變化」等要求，堪稱「足以代表國家風景的大型景區」，而大屯山群則相對缺乏這些特徵。⁴⁵ 這導致大屯山群在自然條件上存在先天不足。若要使其成為國立公園，只能依靠後天的調養來改善體質。河村徹建議，大屯國立公園的推動應由「行政機關主導」，且須政府「投入大筆經費」，以「補充必要的人為設施」。⁴⁶ 顯然，即便大屯山群已被列為候補地之一，委員們對其資格仍存在諸多疑慮。

提出質疑的委員中，又以學者反對最力，其中代表人物為早坂一郎和日比野信一。時任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地質學講座教授的早坂一郎，從地理環境的角度指出，臺灣的自然地理特徵在於其「位於極低緯度，接近赤道及熱帶區域」。然而，從臺灣南部的大武山至鵝鑾鼻一帶，尤其是恆春半島，不僅「可看到珊瑚礁生態，也能觀察到熱帶魚優游於美麗的珊瑚礁之中」，這些景觀可以被視為「熱帶臺灣地理特徵的典型熱帶景觀」，因此更適合作為候補地。在會議結束後，他進一步指出，雖然大屯國立公園候補地擁有火山，但在日本12座國立公園中，已有8座包含火山景觀，其中尤以大阿蘇山最具盛名，因此不適合再作為候補地。⁴⁷

臺北帝國大學植物學第一講座教授的日比野信一支持早坂一郎的看法，並建議應將具備「熱帶要素」並能彰顯「臺灣特色」的恆春半島一帶納入國立公園。他同時認為，臺灣應該只需設立一座國立公園。會後，他進一步解釋了他的立

⁴⁴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頁16。

⁴⁵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頁14-16。

⁴⁶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頁43-44。

⁴⁷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頁53-58；早坂一郎，〈臺灣の國立公園〉，《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26卷第251期（1936年4月），頁182-189；早坂一郎，〈臺灣の國立公園事業に對する希望〉，《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頁238。

場。他指出：臺灣設立國立公園的意義，與當時國際及日本設立國立公園的原因截然不同。所謂國立公園，應該包括那些「能給國民帶來深刻感動的大風景地」以及具有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等「需要國家保護的國有紀念物」。因此，這些景點應該被保存與保護，以涵養國民的國民性。依此觀點，若將次高太魯閣和新高阿里山與日本國立公園相比，仍是具有特殊性；相比之下，雖然大屯山群擁有火山地形和具有熱帶特徵的硫磺谷植物群落，但無法與日本和爪哇的國立公園相匹敵。總之，他們認為大屯山群成為國立公園的條件相當「貧弱」。⁴⁸

然而，無論是會議中還是會議後，他們的建議皆未受到太多重視。正如臺灣總督中川健藏所言，這一區域已經是事先決定的事項，⁴⁹ 因此，會議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劃定具體範圍，而非討論區域的存廢或大幅度的更動。由此可見，政府在推動臺灣國立公園制度化方面的主導性及其付出的努力。不過，政府也意識到，光憑政策推動是不夠的，必須依靠地方人士的支持和協助，計畫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應運而生。

叁、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的推動

一、大屯國立公園協會之成立

羽生南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了吸引外國觀光客以拯救疲弊的財政，日本政府除了積極宣傳本國的風物、文化和產業外，也在設施建設和接待方面投入極大心力。為此，日本以國家機關為首，統合相關單位，協調官民合作，

⁴⁸ 日比野信一的看法與早坂一郎一致，至於「臺灣特色」一語則出自日比野信一在《臺灣の山林》的文章。詳情見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頁53-56；日比野信一，〈臺灣の國立公園に關する吾人の意見と希望〉，《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頁224-231。

⁴⁹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頁68。

成立各種推動國內觀光的組織。⁵⁰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的產物。在大屯山群被列為國立公園候補地後，1934年10月31日下午2點半，臺北商工會於表町事務所召開總務部會議，專門針對推動中的大屯山公園計畫研議因應措施。經過廣泛討論後，正式決議成立「大屯國立公園協會」。⁵¹ 其後，11月5日，臺北州知事野口敏治召集25位地方人士，在臺北州廳的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進一步推動此計畫。⁵²

這25位成員，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行政單位相關人士，包括官員和議員。官員部分，如基隆市尹桑原政夫、臺北市尹松岡一衛、七星郡守佐藤勝也、宜蘭郡守田中國一、基隆郡守安銓院貞熊；議員部分則包括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荒木正次郎、郭廷俊、木村泰治，臺北州協議會會員許智貴、中辻喜次郎、山本義信，以及臺北市協議會會員安田勝次郎、陳振能、大澤貞吉、近藤勝次郎等。在臺北州政府的政策推動下，這些成員皆積極參與推動公園設立。協會辦公室也設於臺北州廳內，更透露出其濃厚的行政屬性。

第二類是與草山地區有直接關聯的人士，主要是長期在草山活動或與當地產業利益相關者，後者有一些人同時兼具議員身分，例如擁有草山地區大規模土地的木村泰治、在草山設有別墅的山本義信等。⁵³ 這一類成員的參與，反映了對草山開發的現實需求。

第三類則是來自學界的學者專家，主要具備自然風景及火山研究的專業背景。他們運用專業知識，為國立公園設立提供理論支持，並在論證過程中扮演重

⁵⁰ 羽生南峰，〈臺灣觀光事業の促進を望む〉，《交通時代》，第7卷第6期（1936年6月），頁73。

⁵¹ 〈臺北商工會 總務部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1月1日，版5。

⁵² 臺北州著，王秀美譯，〈「從國立公園來評估大屯山彙」座談會〉，收入李瑞宗主編，《尖帽峽：陽明山國家公園譯文集》（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0年），頁2-16。

⁵³ 關於這些人在草山的活動，詳情見許佩賢主持，《109-110年陽明公園及其周邊日治時期人文歷史調查委託辦理案》，頁33-49、441-452。

要角色。例如，他們指出，大屯山群擁有火山地形、特殊植物及交通便利等特色，足以作為國立公園的候補地。⁵⁴

最後，在與會者一致同意下，會議進入《大屯國立公園協會規約》的逐條審議。規約明定：「本會旨在推動將大屯山群及其周邊景勝地設立為國立公園，並以實現此目標為努力方向」。協會訂定6項主要事業：（一）推動各項建設；（二）宣傳與介紹；（三）成立視察觀光會；（四）研究調查設備和設施；（五）與其他有相同目標的團體聯絡；（六）保護與開發自然資源。⁵⁵至此，一個匯集產、官、學界力量，致力推動大屯國立公園設立的組織正式成立。

協會成立後，於1934年12月23日召開理事會。會中提出設立國立公園的建議案，強調國家公園可促進國民保健、休養與教化，並有助於觀光事業，吸引國內外旅客。同時，臚列大屯山群的豐富觀光資源，包括火山地形、原始高原、原生森林、珍稀植物、多處溫泉、北投石、海蝕石門等天然紀念物，以及芝山岩、淡水、基隆等地的史蹟。此外，大屯山群鄰近淡水、基隆兩港，交通便利，便於開發利用。然而，協會也坦言，僅靠地方的力量難以符應「一般之要望與文化進展」，必須從全局出發，制定根本計畫，由國家主導推動，方能達成目標。⁵⁶

此建議不僅再次確認大屯國立公園的設立是延續先前政策脈絡而來，也說明協會視國立公園為推動觀光事業的重要基礎。接下來，協會必須運用上述資源與特色，規劃策略，吸引人潮前來。

⁵⁴ 例如植物學家日比野信一和登山專家沼井鐵太郎的發言。臺北州著，王秀美譯，〈「從國立公園來評估大屯山彙」座談會〉，收入李瑞宗主編，《尖帽峽：陽明山國家公園譯文集》，頁4-5。

⁵⁵ 臺北州著，王秀美譯，〈「從國立公園來評估大屯山彙」座談會〉，收入李瑞宗主編，《尖帽峽：陽明山國家公園譯文集》，頁13-15。

⁵⁶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 開理事會評議員會 附議九十年年度豫算及可決建議案 近日欲向要路建議〉，《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2月23日，夕刊版4。

二、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的宣傳與推廣

此一階段，大屯國立公園仍僅屬候補地。對協會而言，亟須向社會大眾宣傳大屯山群的特色，一方面修正風景「貧弱」的負面印象，另一方面喚起原本冷漠、「事不關己」的民眾關注。於是，趁著日本政府改正《行政諸法臺灣施行令》，將《國立公園法》正式納入臺灣施行，隨後於1935年10月20日公布《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官制》之際，大屯國立公園協會也同步發行了《大屯山彙：國立公園候補地》手冊。該手冊以文字、圖畫和照片交互編排的方式介紹候補地概況。內容包含協會成立宗旨、大屯山群的山容、地貌、植被分布，以及周邊史蹟名勝與天然紀念物，基本上是先前建議書的延伸與擴編。其中，金子常光繪製的〈大屯山彙〉圖，將各大山脈、人文史蹟、天然紀念物及觀光景點系統性的整合並加以細緻描繪。手冊共收錄32張照片，每張均附以解說文字，⁵⁷ 透過圖片、照片等生動直觀的視覺材料，加強對大屯山群自然風貌與文化價值的宣傳。同時，配合「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的舉行，臺灣總督府設置草山分館作為宣傳大屯國立公園的重要場域，⁵⁸ 大力增強宣傳的力道。

此外，協會成員也不時於期刊上發表文章，積極描述大屯山群的特色。1936年7月，臺灣國立公園協會與臺灣山林會進行合作，在《臺灣の山林》雜誌中發行特別企劃「臺灣國立公園號」，旨在提供國立公園設立計畫所需之資料，同時也致力於介紹與宣傳各候補地。⁵⁹ 在該期專號中，針對大屯國立公園候補地的介紹，沼井鐵太郎指出：「相對於南方沉積岩第三紀地層呈直線型山貌，富含豐富曲線、向北連綿而上的火山山脈，可謂誇張地在臺北盆地形成了世上罕見的美景」；⁶⁰ 大橋準一郎則再度揭示大屯山群的幾項主要特色：雖無雄壯宏偉之感的

⁵⁷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大屯山彙：國立公園候補地》（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35年）。

⁵⁸ 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臺灣博覽會，1939年），頁368-371。

⁵⁹ 中瀬拙夫，〈臺灣國立公園號の刊行に就て〉，《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無頁碼。

⁶⁰ 沼井鐵太郎，〈臺灣國立公園候補地の山谷を截る〉，《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頁35。

山脈，卻擁有引人注目的火山地形、可眺望遠景的景觀，加上能夠「增添大屯山風景」的人為遺跡以及地理位置親近便捷，⁶¹皆使大屯山群具備成為國立公園的條件；谷河梅人則特別強調，草山地區設有旅館、舞廳、遊樂園等設施，且每逢1、2月降雪時節，便有遠從上海、福州、香港等地的旅客搭乘飛機來臺登山。他們一邊賞雪，一邊跳著華爾滋和探戈，在這些自然與人文條件的加乘下，大屯山群宛如一處「夢幻般的國立公園」。⁶²

協會在積極宣傳大屯山群特色的同時，也著手規劃登山路線。1936年，《臺灣日日新報》社有鑑於近年臺灣登山人口日漸增加，為促使大屯山群、桃園臺地及新店等地成為遊客探索溪谷之美與高原風光的登山遊樂地，決定向社會推薦登山路線。經過遴選，最後選出25條推薦路線，並於5月29日在臺北州廳會議室進行討論。⁶³當天有不少與會者都是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的成員。⁶⁴其後，1937年4月，《臺灣日日新報》社漫畫編輯野村幸一出版《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將上述登山路線收錄於該書，其中有9條即位於大屯山群。⁶⁵有趣的是，該書還特別列出一條「大屯國立公園」的專屬登山路線。⁶⁶總括而言，協會藉由期刊雜誌、圖畫、宣傳小冊和登山路線規畫等多元方式，大力推廣大屯國立公園的設立與發展。

⁶¹ 大橋準一郎，〈大屯山彙〉，《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頁202、204。

⁶² 谷河梅人，〈夢の大屯山國立公園〉，《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頁242-243。

⁶³ 〈「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あす銓衡委員會まづ北部二十五コースにつき 臺北州廳會議室で〉，《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5月29日，夕刊版2。

⁶⁴ 例如荒木正次郎、谷河梅人、平澤龜一郎、大橋準一郎、三輪幸助。詳見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大屯國立公園協會規約及會員名簿》（臺北：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38年）；〈二十五コースを原案通りに承認北部の「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けふ推薦詮考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5月30日，夕刊版2。

⁶⁵ 9條路線如下：第3條（第3條的桃園臺地路線）、第4條（觀音山）、第5條（菜公坑山）、第6條（七星山）、第7條（大屯山）、第8條（紗帽山）、第10條（不動龍）、第12條（大嶺峠）、第13條（大嶺峠——金山）。野村幸一，《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

⁶⁶ 野村幸一，《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頁49-55。

協會除積極宣傳外，在推動建設方面，也同步展開觀光設施的規劃與建議。例如1937年5月，協會首先進行大屯山群觀光道路的踏查，隨後於6月12日召開緊急理事會，針對推動建設提出多項具體方案。會中主要討論如下：（一）向臺灣總督府建議，詳細調查大屯山群，並積極指定其為國立公園；（二）向臺北州知事建議，以大屯山為中心建構完善的道路系統；（三）向臺北州知事建議，在菜公坑山附近設置休息站；（四）向交通局總長建議，在草山地區開設並經營鐵道旅館；（五）建議相關單位，設置草山到竹子湖間的遊覽巴士路線，並增加前往菜公坑的新觀光道路公車及司機。⁶⁷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協會中的部分成員本身也是政府官員，因此能運用手中的資源和權力，將上述建議落實於實際建設之中。

1936年6月8日，協會召開理事會和第一次總會。在會議上，新莊郡守金子辰太郎提議開鑿觀音山山路，並將觀音山納入宣傳範圍。與此同時，他正計劃投入5萬元資金，用於開鑿竹子湖至大屯山的道路，並增設50支登山指示標誌。⁶⁸ 若此道路開鑿成功，未來遊客從臺北市搭車出發，途經草山、竹子湖時，便可欣賞到七星山硫氣孔的壯觀景象，並在越過小觀音山腰後，往左即可眺望到臺北盆地的美麗景色。當進入大屯鞍部，繼續前行至菜公坑平⁶⁹時，還能從淡水一帶眺望蔚藍的臺灣海峽。協會甚至希望將道路延長至面天平，以通往北投和淡水，同時從竹子湖硫氣孔附近越過鞍部，與金山相連。⁷⁰

配合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在地方的宣傳活動，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也開始進行調查，並以調查結果為基礎，召開會議進行討論。此時，距離大屯國立公園的成立已剩最後一步。

⁶⁷ 〈大屯國立公園の 指定促進を協議 きのふ緊急理事會で〉，《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6月13日，版7。

⁶⁸ 〈大屯國立公園總會 理事會時金子新莊郡守 希望觀音山必加入宣傳〉，《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6月9日，夕刊版4。

⁶⁹ 「菜公坑平」、「面天平」、「大屯平」等地名中的「平」為山與山之間的臺地之意。

⁷⁰ 〈大屯山の横ッ腹に ドライヴ・ウェイ 國立公園事業の魁に〉，《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2月2日，版5。

肆、大屯國立公園的成立

一、大屯國立公園成立的行政過程

在第一次國立公園委員會通過對三大國立公園候補地的評估後，臺灣總督府再度派遣專業人士對這些地點進行踏查，以確定國立公園的範圍。1937年7月8日，總督府土木課技師早川透、技手神戸遜及林業部長關文彥開始踏查大屯山、面天山、竹子山、觀音山、淡水、七星山等地。⁷¹ 經過踏查，調查團認為，由於七星山、竹子山和小觀音山為軍事要塞地區，因此決定將這些地區排除在大屯國立公園的範圍之外。⁷² 隨後，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於1937年11月25日召開會議，決定三處國立公園的範圍和面積。會議中，日比野信一再度聯合松岡富雄、坂本素魯哉等2位委員，表示反對將「面積小、比內地國立公園遜色」的大屯山群指定為公園。然而，幹事山縣三郎則表示：「大屯山群作為候補地已在第一次委員會中決定，今後只需增強設施，彌補其自然條件上的不足，即可成為一個壯麗的國立公園」。⁷³

1937年12月27日，依據臺灣國立公園調查會的決議，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正式公告，指定臺灣的國立公園為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與大屯國立公園。其中，大屯國立公園的範圍包括紗帽山、大屯山、菜公坑山、面天山及觀音山，總面積為8,265公頃。⁷⁴

⁷¹ 〈大屯山國立公園候補地 あすから實地踏査 早川技師一行が出發〉，《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7日，版7。

⁷² 〈臺灣國立公園の 區域原案成る 大屯公園は七星竹子山を除外 廿五日特別委員會附議〉，《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0月23日，夕刊版1。

⁷³ 〈國立公園の區域 原案通りに可決 けふ委員會を開いて 總督より近く指定〉，《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1月26日，夕刊版1。

⁷⁴ 山口一重，〈雄大なる三公園—その紹介と順路／大屯國立公園〉，《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2月27日，版6。

從臺灣總督府選定大屯山群為國立公園候補地，並召開第一回國立公園委員會會議予以通過，再到過程中幾乎忽視反對意見，這一系列舉措無不顯示出臺灣總督府的主導地位。正是因為如此的強勢推動，儘管大屯山群的風景被認為「貧弱」，它最終仍能順利列入臺灣三大國立公園之一。

然而，大屯國立公園成立時，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國立公園的成立宗旨也因此增添了戰爭的色彩。內務局認為，在此國家面臨艱難時期、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努力克服困境的背景下，國立公園的誕生實為應時之舉。⁷⁵ 國立公園被視為有助於「提升國民體能」並「振興國民精神」，這正是當時國立公園五大使命中的前兩項。其餘三項則為「涵養自然愛護的觀念與美的情操」、「教化與教育」及「觀光」。山縣三郎認為，「官民今後應致力於保護與開發自然中的原始大風景，使國民能夠親近大自然，並感受由自然所創造出雄壯與美麗的國土英姿，從而開闊胸襟，進而提升國民氣勢與保健教化」。⁷⁶

隨著戰時體制的建立以及國立公園新使命的附加，宣傳方式也隨之改變。

首先，以組織來說，臺灣國立公園協會成為宣傳的主力。自1935年8月1日成立以來，臺灣國立公園協會開始統合全臺的國立公園協會，並在臺北市、臺南州、高雄州、新竹州、花蓮港廳和臺東廳等地設立支部，⁷⁷ 同時解散了太魯閣國

⁷⁵ 內務局土木課，〈非常時局に誕生せる臺灣の三國立公園〉，《部報》，第15期（1938年2月），頁16-17。

⁷⁶ 山縣三郎，〈臺灣國立公園の指定に當りて〉，《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頁4-5。

⁷⁷ 「新竹州臺灣國立公園協會ニ對スル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五七六九號）」（1937年7月1日），〈昭和十二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769021；「高雄州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經費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五七二〇號）」（1937年7月1日），〈昭和十二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831005；「臺灣國立公園協會及同協會臺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昭和十三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861001；「臺北市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昭和十四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872011；「臺東廳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經費ニ對シ廳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二五五七號）」（1940年3月1日），〈昭和十四年國庫

立公園協會和高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⁷⁸此一決定早在1935年9月協會召開理事會時就已經作出。⁷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唯獨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未被解散，至於原因，由於史料的限制，暫時不得而知。到了1938年，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已發展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擁有31位顧問和256位會員（包含評議員、理事、常務理事）。其成員主要仍由協議會員、實業家和官員所組成。⁸⁰協會的運作經費除來自會員會費外，還有來自總督府「廳地方費」的補助。⁸¹

其次，無論是臺灣國立公園協會還是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其任務也隨時局變化而調整。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最初的使命是推廣國立公園作為「可資國民保健休養，乃至教化，並促進觀光事業」。然而，自1937年起，協會新增了「提升國民體能」和「確保國民保健」的新任務。⁸²至於臺灣國立公園協會，成立初期的目的是「調查研究國立公園，力圖思想之普及，從而促進國立公園的設立與發展」，並「連絡並統籌全島各地名勝，完成觀光事業」。然而，到了1938年，協會已經將「增加可提升國民體能之設施」視為最重要的任務。

總之，此階段形成由臺灣國立公園協會主導，大屯國立公園協助推廣的宣傳模式。兩大協會除了要推動當地的觀光事業外，也必須實踐國立公園的新使命。

補助永久保存第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883011；「臺灣國立公園協會花蓮港廳支部二對シ廳費補助認可」，〈昭和十五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五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896007。

⁷⁸ 〈國立公園協會支部を設置 きのふ役員會〉，《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8月18日，版5；〈協會を解散し 支部を設置 本格的に新高阿里山宣傳〉，《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8月25日，版5。

⁷⁹ 〈臺灣國立公園協會 きのふ初理事會 副會長を互選の後 各種事業を打合せ〉，《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9月17日，版7。

⁸⁰ 詳情可見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大屯國立公園協會規約及會員名簿》。

⁸¹ 「國立公園協會經費補助（臺灣國立公園協會長）（指令第五八六七號）」（1935年10月1日），〈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二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645009，頁373。

⁸²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州費補助認可」，〈昭和十三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四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854014，頁317。

二、大屯國立公園正當性的充實

（一）自然風景的強調

1938年1月，日本國立公園協會受臺灣國立公園協會委託，在其固定發行的期刊《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中，特別規劃了「臺灣國立公園指定紀念號」，⁸³ 針對日本本土讀者進行宣傳。該期共收錄38篇文章，其中有關大屯山群的文章有12篇，與另兩座國立公園的相關文章亦為12篇。相較於1936年《臺灣の山林》發行的「臺灣國立公園號」，該期共有47篇文章，以大屯山群為題者僅有4篇，可見此次紀念專號中大屯山群文章的比重明顯增加。此次刊載的12篇關於大屯山群的文章中，有10篇為該地的調查報告，內容涵蓋地質、動植物、氣候及人文史蹟等多個面向，其中有部分文章是以1936年「臺灣國立公園號」為基礎加以補充與延伸。

以地質來說，早在「臺灣國立公園號」中，鳥居敬造就已對大屯山群的地質及其分布情形有所描述。⁸⁴ 至於「臺灣國立公園指定紀念號」，則由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的專家丹桂之助、齋藤齋和國府健次負責撰文。值得一提的是，丹桂之助和國府健次在此前已陸續在《臺灣地學紀事》發表過大屯山群的地質研究成果。⁸⁵ 在此次紀念號中，三位專家分別發表了〈大屯國立公園附近の地形と地質〉、〈大屯火山彙の地質に就て〉和〈大屯山彙の温泉〉等文章，論述大屯山群火山的成因、分布及其對地形與環境的影響。⁸⁶ 之所以針對地質進行討論，

⁸³ 作者不詳，〈編輯後記〉，《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頁80。

⁸⁴ 鳥居敬造，〈地形及地質構造より見たる國立公園の概観〉，《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頁46-47。

⁸⁵ 茲舉數例：丹桂之助，〈大屯火山彙に發達する平坦面に就いて（豫報）〉，《臺灣地學記事》，第2卷第3期（1930年11月），頁35-37；丹桂之助，〈觀音火山の噴出期に就いて（續報）〉，《臺灣地學記事》，第5卷第2期（1934年3月），頁11-16；國府健次、山下一男，〈大屯火山彙に關する地質化學的研究（II）七星山及びその附近に於ける安山岩に就いての地質化學的研究〉，《臺灣地學記事》，第3卷第2期（1932年2月），頁1-4；服部武彦、國府健次、山本重吉，〈火山後期作用による安山岩の腐蝕分解の一適例〉，《臺灣地學記事》，第5卷第8期（1934年7月），頁65-71。

⁸⁶ 丹桂之助，〈大屯國立公園附近の地形と地質〉，《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7年12月），頁27-31；齋藤齋，〈大屯火山彙の地質に就て〉，《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

主要原因在於火山地形乃大屯國立公園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此外，此時期對大屯山群火山的研究，也帶有凝聚國民性的意涵。早在明治時期，日本就將火山視為形塑日本國民性的重要地理景觀。⁸⁷ 昭和時代的地質學者脇水鐵五郎更曾指出，大和民族正是在火山灰覆蓋的土地上孕育而生；以富士山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火山山脈構成了日本國土的骨幹。其中九州一帶，則以阿蘇山、霧島山為起點，沿著琉球群島一路延伸至臺灣的大屯山。⁸⁸ 在此脈絡下，此時期對大屯火山的研究實際上帶有強調臺灣作為日本國土的延伸部分，可藉此用來塑造大和民族特性的意涵。除此之外，有關動植物、氣候、礦物等主題的文章，也廣邀專家撰寫，在在彰顯大屯山群的地理、生態特殊性。整體而言，相較於先前的「臺灣國立公園號」，「臺灣國立公園指定紀念號」的內容，無論是廣度或深度均更為深入。

在「臺灣國立公園指定紀念號」中，亦有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成員撰文推薦。例如，林業部長關文彥指出：「自然和人為的巧妙創造皆屬美的展現」，意在說明該地區的產業活動也是自然的一部分；⁸⁹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則信心十足地表示：「毫不懷疑地相信，將來（大屯國立公園）會成為我國國立公園中首屈一指的地方」；⁹⁰ 臺北州知事藤田俱治郎與之呼應，指出：「與前兩座面積廣大的國立公園不同，大屯雖小，或許是全國面積最小的國立公園，但其大眾利用性卻是最高的」。藤田強調，大屯山群有別於以山岳風景為主的新高阿里山和次高太魯閣，不僅同時擁有海景與山景，更是臺灣唯一的火山群，山容秀麗，地貌豐富。他坦言，大屯山群或許缺乏「令人感動與震懾」的壯闊景觀，但卻「容

（1937年12月），頁31-36；國府健次，〈大屯山麓の温泉〉，《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7年12月），頁36-40。

⁸⁷ 矢津昌永在1902年出版的《地理學小品》中指出，活躍的火山活動造就了如金字塔般的高峰，以及如芙蓉綻放的秀姿。他認為，眺望這些山巒，能培養日本國民崇尚高潔、重視節操的氣質。詳見矢津昌永，《地理學小品》（東京：民友社，1902年），頁65-66。

⁸⁸ 脇水鐵五郎，《日本の風土・支那の風土》（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41年），頁38-39。

⁸⁹ 關文彥，〈國立公園は産業を沮害するか否人爲も亦自然なり〉，《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頁19-23。

⁹⁰ 山中樵，〈大屯の史實と史蹟〉，《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頁57。

易為大眾所親近」，且「四季皆蘊藏著無窮的樂趣」。⁹¹此外，木村泰治亦以生動比喻強調大屯山群雖面積不大，卻極具魅力，如同品嚐山椒一樣，「雖然顆粒細小，但辛辣有勁」。⁹²

從內容上來看，「臺灣國立公園指定紀念號」大多只是單純地介紹與推廣大屯國立公園。相比之下，臺灣國立公園協會和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在臺灣的宣傳活動則明顯帶有更積極的雙重意涵：一方面推動觀光發展，另一方面則肩負訓練國民身心、提升國民體能與精神的時代任務。1938年，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為配合國立公園在戰時體制下被賦予的「振興國民精神」等新使命，並進一步提高國立公園的利用價值，特別邀請日本知名山岳攝影師岡田紅陽來臺，拍攝國立公園風景照。⁹³指定岡田的原因，在於他當時被譽為日本山岳與風景攝影的第一人，作品風格鮮明，尤以彰顯日本精神見長，⁹⁴正好符合國立公園在新時代下所承載的象徵意義。

岡田走訪三處國立公園後發現，相較於新高山和次高山，「大屯」是一座「性格截然不同」的山群，使其具備成為國立公園條件的，並非山岳風景，而是火山群、溫泉、松樹、岩山等足以勾起內地人懷鄉之情的景物。他認為，「這個特殊的臺灣地景，正是能夠迅速撫慰內地人情感的地方」。⁹⁵由此可知，即便大屯國立公園缺乏雄偉高大的山脈，岡田仍努力發掘與日本文化有關的資源，以吸引日本人前來觀光。這點從他所拍攝的〈草山溫泉之源〉、〈竹子湖眺望東南方向〉、〈七星山腹的硫氣孔〉等照片中可見一斑。⁹⁶

⁹¹ 藤田偵治郎，〈臺灣國立公園の誕生に當りて〉，《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頁12。

⁹² 木村泰治，〈臺灣國立公園の特徴大屯山の持つ特異性〉，《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頁39。

⁹³ 〈合歡越道傍に 山の家を建設 タロコの勝景を眼下〉，《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4日，版7。

⁹⁴ 〈風景寫眞の權威者 岡田紅陽氏を招聘 本島の三國立公園を撮影〉，《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4月23日，版7。

⁹⁵ 岡田紅陽，〈臺灣の山岳美・溪谷美〉，《臺灣山岳》，第10期（1939年3月），頁65-66。

⁹⁶ 岡田紅陽攝影，長崎浩編輯，〈臺灣國立公園寫真集〉（臺北：臺灣國立公園協會，1939年），頁1-19。

相對於岡田是以日本民眾的視角為出發點進行拍攝，臺灣國立公園協會則希望讓所有前往公園的民眾，都能透過那些「足以勾起內地人懷鄉之情的景物」來加深認識國土。後來，大屯國立公園協會還從中挑選幾張照片製作成明信片發行，以增強宣傳效果。⁹⁷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的宣傳策略和臺灣國立公園協會大致相同，特別的是，大屯國立公園協會還另外從植物方面著手，這或與該協會的常務理事大橋準一郎有關。1909年7月，大橋準一郎自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林學實科畢業，同年10月即來臺，任職於臺灣演習林。在臺期間，他陸續發表多篇林業相關著作與文章，⁹⁸ 並特別關注植物與風景之間的關係。加入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後，他也開始撰文介紹大屯山群的植物如何構成特殊的風景。他指出，大屯山群「受到特殊氣候、溫泉和硫氣帶的影響，使得此地的植物景觀與其他相同海拔的山區截然不同」。此外，由於四季變化明顯，植物種類隨之更迭，各季皆有其代表性植物，成為構成風景的關鍵要素。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鄉土風景」的概念。由植物構成的風景即為鄉土，其「千狀萬態形成國土的裝飾」，是「認識並理解我國，進而促進國際親善和興亞大業」的重要媒介。正因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因此必須施行林業技術加以保護。¹⁰⁰ 大橋的這一觀點，正與前揭山縣三郎的看法相呼應。

⁹⁷ 〈大屯平の「山の家」と キヤムプ村が本定り 近く建設にかか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6月23日，版7。

⁹⁸ 大橋準一郎，〈緒言〉，《森林學大意》（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6年），無頁碼；「大橋準一郎」（1940年1月1日），〈昭和十五年元在官職者履歷書其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112618178；「大橋準一郎（任府技手）」（1912年10月1日），〈大正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十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2071001。

⁹⁹ 大橋準一郎，〈大屯山彙の四季〉，《臺灣地方行政》，第4卷第2期（1938年2月），頁51。

¹⁰⁰ 大橋準一郎，〈風景の保護と開發〉，《臺灣の山林》，第164期（1939年12月），頁23-24。

然而，這些植物「大部分區域都被栽培的茶樹席捲」，導致林相被破壞、地力被消耗，最後淪為放牧地。其中，山頂火山口濕地以及山腳臺地的低溼地附近更被肆意作為放牧之處。因此，如何保護溪谷的原生林以及次生林植物，已成為當下刻不容緩的要務。¹⁰¹或許是因為大橋對植物相當重視，在他擔任常務理事期間，積極支持大屯山群的植物調查。1938年1月至1940年3月，植物同好會成員針對11條登山路線展開植物調查。1941年7月，大橋準一郎將調查成果以《大屯火山彙植物誌》之名出版，由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發行，書中詳盡介紹了這11條登山路線上可見的特殊植物。¹⁰²從大橋的言論脈絡來看，選擇登山路線進行調查，正是希望藉由讓登山民眾透過認識植物，瞭解大屯山群。他認為，唯有讓民眾親自踏入由植物構成的鄉土風景，才能在認識國土的過程中培養愛國心。

（二）日本性的移植

大橋對於植物、風景與認識國土的關心也表現在實際的櫻花種植上。早在1897年，就曾出現有關竹子湖櫻花的報導。¹⁰³1940年時，日本國立公園協會會長細川護立強調：「保護自然美、彰顯尊嚴的聖蹟和偉績是國立公園事業的兩大重點」，其目的在「統一國民精神」。¹⁰⁴接著，同年3月31日，大橋準一郎在臺灣山岳會的月例會上，大力提倡種植櫻花，因為唯有透過櫻花才能「喚起敷島的大和心，並培育皇國精神」。¹⁰⁵在大橋的呼籲下，該年7月，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為了讓「此等（紀元二千六百年）光榮和歡喜傳於後世」，計劃在大屯國立公園內種植櫻花。此舉不僅可以「增添大屯國立公園的景致」，更有助於「國民精神之

¹⁰¹ 臺北州，《大屯山彙國立公園》（臺北：臺北州，1934年），頁8-9。

¹⁰² 下澤伊八郎編纂，《大屯火山彙植物誌》（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1年），頁36-37。

¹⁰³ 顏杏如，〈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植櫻與櫻花意象：「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01。

¹⁰⁴ 細川護立，〈皇紀二千六百年を迎へて〉，《國立公園》，第12卷第1期（1940年1月），頁1-2。

¹⁰⁵ 大橋準一郎，〈櫻を語る〉，收入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3年），頁60。

昂揚」。¹⁰⁶

1940年7月22日，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於鐵道旅館召開會議，籌備設立櫻花委員會，並決定櫻花種類、種植場地、時期等事宜。大橋在會議上表示，在此之前，實業家木村泰治早已來信表示想從故鄉秋田以空運方式寄櫻花來臺栽種。木村在信中提到，他準備嘗試培植內地櫻，並擬以紗帽山為首要栽種地點，試圖取代路旁的相思樹。他希望在中日戰爭結束後，可以進一步將大屯山群開發為中國華僑、香港及外國觀光客的旅遊勝地，並認為此地的條件優於日本的雲仙國立公園。¹⁰⁷對於木村的建議，大橋和關文彥皆表贊成。

然而，針對櫻花種植的品種，會議上卻發生爭執，大橋和關文彥都認為應該種植日本種櫻花；相反地，山本義信表示：「照顧這塊土地上的櫻花是必要的」、「在此土地上的櫻花，樹木特別強韌」，他還指出：「在臺灣的內地人常將緋櫻形容地如同桃花般美麗，以致從內地來訪的人，無論是伊東巳代治還是德富蘇峰，都不由自主地欣賞起緋櫻的美」。對山本而言，臺灣本土的櫻花不會比日本品種來得差，若想讓日本人接受臺灣櫻花，他建議：「讓花生長地再密集一些，色彩再變淡一點，以更符合內地人在視覺上的偏好」。¹⁰⁸

會議最後綜合兩派意見，決議採取日本種和本島種櫻花並植的方式。主因正如與會者所考量的，日本種櫻花容易因水土不服而枯萎，而且櫻花並非全年盛開，若全面種植，將面臨非花季時期無花可賞的情況，恐影響觀光效益。經討論後，櫻花委員會在第一次會議中決議：此次以日本櫻為主，臺灣櫻為輔，並根據地勢與環境條件選擇適種品種。例如，在草山一帶種植緋櫻，高海拔地區則種植染井吉野櫻，同時也不打算在紗帽山一帶全面種植櫻花。在第二次會議中，進一步決議：在紗帽山與草山一帶，以及草山竹子湖的道路沿線，種植緋櫻2,600株；

¹⁰⁶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紀念 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趣意書〉，收入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紀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頁30。

¹⁰⁷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紀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頁2、4-6。

¹⁰⁸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紀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頁10-11。

在面天坪一帶與大屯山山腳下，則種植染井吉野櫻2,600株。¹⁰⁹

根據前述委員會的決議，大屯國立公園協會進一步擬定計畫書，最終決議於1940至1945年間，分別種植5,000株染井吉野櫻和緋寒櫻。選定的種植地點多集中於登山路徑，包括紗帽山登山道及其周邊、大屯平露營地一帶、草山至竹子湖道路沿線、大屯山腳的振衣亭附近、竹子湖地區、大屯平至面天平沿路，以及竹子湖通往大屯平、面天平及其附近等區域。¹¹⁰ 如此一來，可同時達到三項目標：第一，透過櫻花美景吸引遊客，促進觀光發展；第二，透過登山活動以強健國民體能；第三，使民眾感受到類似日本內地的自然風光，藉此培養民眾的愛國情操。到了1942年，大屯山群已出現多達14處被評選為賞櫻的最佳地點。¹¹¹

在兩大協會積極宣傳的同時，《臺灣日日新報》、《旅と運輸》等報章雜誌亦紛紛刊載景點推薦與設計觀光路線，¹¹² 目的無非是吸引更多民眾造訪大屯國立公園。因此，基礎建設的完善便成為推廣工作中的重要一環。1938年，臺灣國立公園協會將「建設國立公園之家」列為年度重點計畫，並選定大屯國立公園作為第一期計畫的施行地。¹¹³ 同年6月22日，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召開理事會，決議

¹⁰⁹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頁28-29。

¹¹⁰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内櫻植栽報告》，頁32-33。

¹¹¹ 作者不詳，〈大屯彙山とさくらの名所〉，《臺灣運輸月報》，第93期（1942年3月），頁41。

¹¹² 出口一重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推薦大屯國立公園兩條觀光路線，一是臺北、士林、草山、北投、竹子湖、大屯山鞍部、頂北投、新北投；二是臺北、成子寮、觀音山、八里坌、淡水車站。另，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所出版的《旅と運輸》一書中，也推薦大屯國立公園。書中指出，大屯具備「幽邃閑雅且具親近性」、「雖未有水成岩之新高阿里山和次高太魯閣那樣雄偉壯麗的山岳，卻是本島唯一能展現八面玲瓏山岳之美的火山景觀」。此外，「硫氣植物帶」亦被列為其特色之一。其中，鐘狀的紗帽山更被特別推薦為代表性景點。大屯火山群也因此成為鐵道沿線導覽中的必看景點之一。〈觀光コース〉，《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2月27日，版6；作者不詳，〈新に指定を見た臺灣三大國立公園の全貌（三）本島唯一の火成岩系山岳美を誇る 大屯國立公園〉，《旅と運輸》，第9期（1938年3月），頁2、4。

¹¹³ 「臺北州國立公園協會補助認可指令案」，〈昭和十三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三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典藏號：00010853006。

在大屯平至觀音山一帶的緩坡地設置露營村，並興建一座木造建築，名為「山之家」。該計畫將由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出資2,500圓，臺灣國立公園協會補助1,000圓。此設施在夏季主要用於保護與改善青少年體能，在冬季則提供登山客賞雪時作為休憩場所。¹¹⁴ 同年8月27日，「山之家」小屋竣工。¹¹⁵ 至1939年5月，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又計劃在面天平地區增設休息站，並在園區內設置導覽與指引標誌。¹¹⁶

綜合上述，為配合戰時體制下國立公園的新方針，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和臺灣國立公園協會聯手推動各項措施，並透過宣傳以及積極興建如露營村等基礎設施，致力於將此地打造為兼具觀光與身心鍛鍊功能的空間。在所宣傳的自然資源中，比起火山景觀，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反而更重視植物的價值。協會不僅支援植物調查，更於1940年實際推動種植櫻花計畫，顯示出其對植物及其象徵意義的重視。無論是火山地形、大屯山群的原生植物，或是來自日本的櫻花，這些自然元素不僅是吸引遊客入園的觀光資源，也是可用以培養國民愛國心的重要媒介，而得以帶動觀光熱潮，亦可鍛鍊國民體能並培養愛國心。在兩大協會聯手推動，以及戰時體制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背景下，大屯國立公園內逐漸掀起一股登山熱潮。

伍、從登山、觀光到健民

一、作為觀光的大屯國立公園

早在1920年代，臺北便因地理和人口的雙重優勢，在小型登山活動上遠勝於臺灣其他地區，其中尤以大屯山群最受登山者青睞。自1933年起，臺灣的登山

¹¹⁴ 〈大屯平の「山の家」と キヤムプ村が本定り 近く建設にかかる〉，《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6月23日，版7。

¹¹⁵ 〈大屯平の山小屋が竣工 二十七日に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8月27日，夕刊版2。

¹¹⁶ 〈大屯の面天平に 登山者の休憩所—指導標や案内標も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5月20日，版11。

風氣逐漸從「追求近代運動精神與專業登山家」轉變為「強調靜觀自然、親近低山、講求徒步旅行的樂趣」。到了1936年，登山活動已不再是新鮮事，臺灣正式邁入「大眾登山時代」。¹¹⁷ 1937年，臺灣總督府在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時，為將人民培養為可供戰時動員的人力資源，強調提升國民體力和健康，將已經普及化的登山活動作為訓練國民身心的方式之一。¹¹⁸ 而在國立公園登山尤具特殊意義，蓋因國立公園被視為「集國土自然美之精華」的象徵，故在此登山不僅可鍛鍊體能，更能激發民眾對祖國自然之美的讚嘆與熱愛，進而培養愛國情操。¹¹⁹ 這正符合國立公園的兩大使命：「提升國民體能」和「振興國民精神」。在此背景下，地處臺北近郊、交通便利的大屯國立公園，自然而然成為實踐上述使命的絕佳場域。

於是，1939年臺灣山岳會在既有的月例登山活動基礎上，¹²⁰ 新增了「週例登山」項目。週例登山多安排在臺北近郊山區，以輕鬆易行的路線為主。從1939年到1941年4月20日止，該會共舉辦了110次週例登山活動，其中有36次選在大屯國立公園內或途經該地。¹²¹ 不只臺灣山岳會，1938至1940年間，其他團體與組織也時常在大屯國立公園舉辦登山活動，有些活動甚至吸引了超過500人參加。¹²² 此

¹¹⁷ 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臺灣登山小史》（臺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頁173、210、246-247、266。

¹¹⁸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年），頁47-48。

¹¹⁹ 永井浩，〈登山と國立公園〉，《國立公園》，第10卷第7期（1938年7月），頁1。

¹²⁰ 月例登山一開始稱為「有志登山」，1927年10月起改為「大眾登山」，1932年4月起又改為月例登山。參見谷河梅人編纂，《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臺北：臺灣山岳會，1944年），頁6、10、56；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臺灣登山小史》，頁137。

¹²¹ 第7次往菜公坑高原、第10次繞七星山、第12次面天山、第17次紗帽山、第20次越過面天山腳、第21次在大屯平露營、第22次大屯山、第29次大嶺嵴、第33次磺嘴山、第40次百六憂、第41次大屯山、第47次從興福寮往面天山、第51次草山街道、第57次菜公坑山、第58次大屯西峰、第64次越過大嶺嵴到金包里、第66次繞觀音山、第74次從烏尖連峰到紗帽山、第75次大尖山、第76次經過不動瀧從面天山下山、第77次經過大嶺嵴到金包里、第79次從天母溫泉到草山、第82次大嶺嵴、第83次小觀音山、第84次面天山、第89次大尖後山、第90次從竹子湖到七星山、第93次觀音山、第94次面天山、向天山、第97次紗帽山、第99次由菜公坑往北新庄子、第101次草山街道、第102次百六憂、第108次菜公坑山、第110次竹嵩山、第112次磺嘴山。詳情見《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及《臺灣山岳彙報》。

¹²² 〈參加者五百餘 大屯山への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月4日，版4；〈參

外，1938年由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堀川安市等人創立的「臺北子供理科會」，也定期帶領學生到公園內，進行以認識植物、礦物與山川地貌等自然資源的「見學旅行」。¹²³ 此類活動不僅旨在鍛鍊兒童的身心，更藉由引導兒童認識自然資源，進而培養對國土的認同與情感。

由上述活動可知，當時參與登山的人數眾多，且涵蓋各年齡層性別，呈現出老少咸宜、全民參與的景象，充分體現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精神。那麼，這樣的活動是否有達到國立公園的新使命？我們可以1938年12月3日由國民精神總動員臺北州支部舉辦的登山競技賽為例，來具體觀察。本次活動的宗旨為「鍛鍊戰場後方國民的身心」以及「加深國民對大屯的認識」。¹²⁴ 活動結束後，一位參與民眾表示：「在舉世呼應此非常之時，以及喚起在後方之我等的熱誠的今日，若從鼓勵體育、鍛鍊身心、休養精神等各方面著手的話，登山競技會的功效將如泉水般湧出。」此番言論可見，該民眾清楚地認知到此非常時期下國立公園的新使命。不僅如此，他也趁比賽時，飽覽公園的美景。他描述，參賽途中，跑者得以「盡情地欣賞溪谷之美，遙望臺北的街道，俯瞰淡水地區如星點般散落的聚落景觀，即便只能想起基隆河與淡水河相連如直線的模樣，也能激起對大屯山的無限憧憬」。他認為，這場活動的深遠意義，在於逐步擴展對大屯的認識，即從「自己」的大屯，到「臺北」的大屯，最終為「臺灣」的大屯。亦即，自己所熟悉的大屯，不僅能被視作臺北的代表景色，更可堪稱是臺灣的代表景色之一。¹²⁵ 換言之，透過登山活動，參與者不只可鍛鍊身心，更能藉此觀光旅遊、欣賞自然。正如時人所言，前往國立公園旅行不只是休閒娛樂，更具有「觀光報國」的意涵，

加者六百五十 六歳の幼童や七十五歳の老人 落伍者もない 山行》，《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9月23日，版3。

¹²³ 〈臺北子供理科會を創立 十八日竹子湖へ初の見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12月17日，夕刊版2；〈臺北子供理科の會 十八日草山へ採集見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6月16日，夕刊版2；〈採集見學旅行 子供理科の會主催〉，《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0月26日，版8。

¹²⁴ 〈大屯山登山競走 草山との團體往復 國民精神總動員臺北支部主催で〉，《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11月30日，版8。

¹²⁵ 作者不詳，〈臺灣の大屯〉，《臺灣藝術新報》，第5卷第1期（1939年1月），頁62。

透過行走於國土山川之間，以身體力行、鍛鍊體格的方式實踐愛國精神。¹²⁶

屢次舉辦的登山活動也進一步帶動了大屯山地區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以草山眾樂園來說，自1937年起前往泡溫泉的人數逐年攀升：1937年有56,035人，¹²⁷ 1938年增至60,112人，¹²⁸ 至1940年更達83,146人。¹²⁹ 至於北投一帶，雖然自1937年臺灣總督府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政策後，要求民間自肅、節約，¹³⁰ 地方政府因而對藝妓活動有所管制，¹³¹ 但這些管制措施並未影響來這裡泡溫泉的人潮。以北投公共浴場為例，1937年有51,006人，¹³² 1938年為63,941人，¹³³ 到了1940年達到68,336人。¹³⁴ 綜觀而論，大屯國立公園原本以「健康」、「養生」為主要訴求，隨著戰時體制的推進，其功能逐步轉型，成為兼具觀光與訓練國民身心於一體的多功能場域。

或因觀光效益不錯，1940年臺北州政府曾計畫以大屯國立公園為中心，串聯金山、基隆等地，打造一個更大規模的觀光勝地。該計畫構想鋪設金山到草山，以及基隆到金山之間的道路，並在金包里興建公共浴場，作為療養勝地。若計畫能實現，預期將出現一座「保健行樂的天國」。¹³⁵ 然而，隨著戰局惡化，此計畫無疾而終，也未見後續討論。國立公園的發展也隨時局的變動，逐步轉變成另一

¹²⁶ 〈觀光報國強調のスタンプ〉，《旅行ユース》，臺北，1938年5月1日，版4。轉引自葉柏強，《顧我洄瀾：花蓮歷史影像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4年），頁82。

¹²⁷ 中村不羈兒，《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二年度》（臺北：臺北州方面委員聯合會，1939年），頁70。

¹²⁸ 中村不羈兒，《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三年度》（臺北：臺北州方面委員聯合會，1939年），頁70。

¹²⁹ 石川真澄，《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五年度》（臺北：臺北州方面委員聯合會，1941年），頁80。

¹³⁰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頁305。

¹³¹ 〈北投溫泉郷にも自肅の戒め〉，《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9月18日，夕刊版2；〈北投溫泉郷の女群連は自肅〉，《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8月3日，夕刊版2。

¹³² 中村不羈兒，《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二年度》，頁71。

¹³³ 中村不羈兒，《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三年度》，頁71。

¹³⁴ 石川真澄，《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五年度》，頁81。

¹³⁵ 〈行樂天國の出現 草山、金山庄間の自動車道路—州豫算に開鑿費を計上〉，《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月21日，版7。

種型態。

二、作為健民地的大屯國立公園

194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局勢緊張，國家對於國民健康與體力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日本政府亦相應推動一系列提升國民體力的政策。¹³⁶ 在此背景下，國立公園逐漸被去除觀光的功能，轉變成純粹訓練國民身心的場域。1941年，日本國立公園協會會長細川護立直言：「不能單純地把國立公園視為觀光資源，而應更有力、更積極地推動，使其成為全國人民皆可活用的場域」¹³⁷ 面對此變局，林學家田村剛提出「新國立公園」論。他指出，日本國立公園最大的問題就是除了少數幾處以外，大多位處偏遠，民眾難以所及。因此，將來必須「適當地配置國立公園」，積極擴充所謂的「健民地」，並將之納入國土計畫之中。¹³⁸ 如此一來，不僅能讓國民就近利用公園，節省交通與住宿成本，也能使長久浸淫於都會娛樂的人們親近大自然，進行健全的身心活動，進而隨時能夠「改善體質」，為國家培養堅實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由於新選入的公園多位於家鄉附近，可藉此培養愛鄉之情，進而凝聚愛國心，最終達到「振興國民精神」的目標。¹³⁹

至於臺灣，雖然臺灣國立公園協會並未如日本國立公園協會般提出相應的宣言，但在實際運作上，臺灣國立公園的發展方向已與日本本土趨勢相符。隨著1940年代戰事升溫，臺灣的觀光業受到衝擊。1941年，總督府鐵道部正式廢止觀光係，臺灣旅行俱樂部亦於同年宣告解散。此後，觀光業務逐漸縮減。¹⁴⁰ 在此背

¹³⁶ 詳情見許佩賢，〈戰爭時期的身體動員與健民運動〉，收入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臺北：衛城出版社，2015年），頁269-270。

¹³⁷ 作者不詳，〈國立公園協會第十回總會に際して〉，《國立公園》，第13卷第3期（1941年6月），頁1。

¹³⁸ 田村剛，〈時局下の國立公園と新日本國立公園の提唱〉，《國立公園》，第13卷第5期（1941年9、10月），頁31。

¹³⁹ 田村剛，〈時局下の國立公園と新日本國立公園の提唱〉，《國立公園》，第13卷第5期（1941年9、10月），頁31。

¹⁴⁰ 蔡龍保，〈由觀光活動到觀光產業：日治時期臺灣觀光產業化過程之探析〉，「臺灣歷史上的家族、社會與國家暨許雪姬特聘研究員榮退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

景下，大屯國立公園的觀光功能逐漸式微，負責推動觀光的大屯國立公園協會自1941年起其業務也明顯減少。1942年1月，該協會召開常務理事會，討論種植櫻花以及新北投至面天山的道路修築等議題。¹⁴¹ 此後，再無相關紀錄見諸於史料。

然而，儘管觀光事業日漸式微，登山活動卻並未因此中斷，原因主要有二：第一，1941年，臺灣總督府配合厚生省「鍛鍊體力、守護國防」的口號，積極推行「健康增進運動」。¹⁴² 其中，登山活動受到臺北市教化聯合會和趣味登山會的共同提倡，並以「實踐市民之臣道、鍛鍊出質樸和剛強的精神」為目標，推行所謂的「新體制健行」。¹⁴³ 其目的正如臺灣山岳會會員出口一重所言，即是「登山報國」。¹⁴⁴ 第二，1941年臺北市為配合南進政策，加強市政機能，規劃了「島都計畫」。該計畫中，大屯國立公園被規劃為臺北市北部的公園綠地，目的是讓市民能夠就近運動，以隨時提升體能、強健體魄。¹⁴⁵

受「島都計畫」與「新體制健行」政策推動的影響，大屯國立公園再次掀起一波登山熱潮。以《臺灣日日新報》自1941年3月21日開設的「登山ハイク」專欄為例，該專欄後續數度更名為「登山とハイク」、「登山と遠足」，並持續刊載至1944年3月23日，總計發表了314則登山活動訊息。這些活動多集中於北部近郊山脈，其中有76次是在大屯國立公園內或行經該地舉辦。專欄內容主要以臺灣山岳會、萬華登山會和趣味登山會舉辦的活動為主。就臺灣山岳會而言，主要刊載「月例登山」和「週例登山」。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4月起，臺灣山岳會將週例登山更名為「厚生登山」，¹⁴⁶ 並於1942年1月11日再將月例登山更名為「鍊

灣史研究所，2023年9月21-23日，頁15-16。

¹⁴¹ 〈紗帽山、大屯山麓に 三千本の緋櫻植栽〉，《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月23日，夕刊版2。

¹⁴² 許佩賢，〈戰爭時期的身體動員與健民運動〉，收入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頁270-273。

¹⁴³ 〈新體制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月8日，版3。

¹⁴⁴ 出口一重，〈戰時下登山報國の一路を辿りて〉，《臺灣山岳叢報》，第14卷第3期（1942年3月），頁1。

¹⁴⁵ 臺北市役所，《臺北都市計畫地域設定說明書》（臺北：臺北市役所，1941年），頁6。

¹⁴⁶ 谷河梅人編纂，〈編者のことば〉，《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無頁碼；谷河梅人編纂，《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頁166。

成登山」。¹⁴⁷ 厚生登山和鍊成登山的不同在於，前者重點在親近自然與加深對皇國國土的認識，後者則側重於體力、耐力和精神力的訓練。¹⁴⁸ 這兩類活動恰好分別對應國立公園在戰時所肩負的兩個重要使命——「振興國民精神」和「提升國民體能」。透過實踐，這些登山活動不僅具體落實了國策方針，也進一步鞏固與強化國立公園在總動員體制下的功能定位。

在登山參與者當中，青少年的角色尤為值得關注。因應戰局變化，臺灣總督府自1939年起擴大青年團的組織規模，並成立青年學校，實施基礎軍事訓練。青年團隱然成為士兵養成機關。¹⁴⁹ 此一背景下，山岳正可作為訓練青年身心的天然場所。當時不只有男性，也有特別針對女性青年設計的訓練活動，吸引了大量青年的參與，顯現登山在體能訓練體系中的重要地位。¹⁵⁰ 對此，曾任臺北州農務課長的平澤龜一郎曾指出：「若要增進青年體力、陶冶其精神，我相信沒有比登山更好的方法了」。在他看來，透過與雄偉壯麗的大自然接觸，青年不僅在精神上能受到深刻的感化，也可以鍛鍊身體，進而養成質樸堅強的性格。他特別強調：「臺灣山岳大多尚未開發」，因此更能讓人體會原始自然「壯麗的風景、清新的空氣和崇高的山靈」，在這樣的環境中，「所有（登山過程的）艱辛都會頓時消解」。而這樣的登山體驗其實是一種精神與體力的修練，其最終目的即是為了能夠塑造出「符合高度國防國家要求」的理想國民。¹⁵¹

¹⁴⁷ 根據谷河梅人在《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一書中的說法，鍊成登山從該會創始以來就開始進行，查詢《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後，較符合此條件為月例登山，原因在於1941年11月舉辦第153回月例登山，再根據《臺灣山岳彙報》，1942年3月進行第155回的鍊成登山，故有此推測。谷河梅人編纂，《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頁178；作者不詳，〈鍊成登山 鳶嘴山行（第155回）〉，《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3期（1942年3月），頁3。

¹⁴⁸ 出口一重，〈戰時下登山報國の一路を辿りて〉，《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3期（1942年3月），頁1-2。

¹⁴⁹ 宮田聖子著，郭婷玉譯，《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頁235-281、330。

¹⁵⁰ 相關活動可參見以下報導：〈大屯山を登る 鐵腳部隊〉，《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8月4日，版3；〈臺北州青年團幹部の登山指導〉，《臺灣山岳彙報》，第13卷第10期（1941年10月），頁5；〈脂粉追放の乙女達 山頂で聖なる訓練 夏に鍛へる女青の幹部〉，《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8月6日，版3。

¹⁵¹ 平澤龜一郎，〈戰時下の登山と國民の鍊成〉，《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1期（1942年1月），頁1-2。

總言之，1937至1940年間的登山活動雖還偶爾帶有觀光功能，但自1941年起，大屯國立公園褪去觀光色彩，澈底轉變成訓練國民身心的場域。

至於其他兩座國立公園，整體情況大致與大屯國立公園相仿。以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來說，根據蔡龍保、洪廣冀和蔡佩蓉的研究，1930年代阿里山林場陷入經營危機，連帶導致阿里山鐵路經營不振。為提振地方經濟，阿里山鐵路遂轉型為觀光鐵路，進而帶動當地觀光產業的發展。¹⁵² 然而到了1941年，臺灣觀光業因戰爭影響受挫，加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林業部進駐阿里山展開伐木作業，¹⁵³ 致使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的觀光功能漸趨式微，轉而成為鍛鍊人民身心以及伐木的場所。當時的《臺灣日日新報》偶爾仍可見學校舉辦以「體位向上」為宗旨的登新高山活動報導。¹⁵⁴ 臺灣山岳會也持續舉辦傳統夏季大規模登山活動，經常將新高山與阿里山列入登山路線。¹⁵⁵ 相較之下，大屯國立公園的登山者多為鄰近居民，新高阿里山則不一定具有地緣關係，因此大屯國立公園獨特的「親近性」反而在訓練國民身心的功能上發揮了更直接而實際的作用。

簡言之，在國立公園籌設初期，相較於風景條件較為「貧弱」的大屯國立公園，新高阿里山和次高太魯閣因具備「大風景」特質而備受重視。然而進入戰爭後期，具備「親近性」特色的大屯國立公園，反而因較符合當時日本對國立公園的新要求（亦即不僅方便民眾隨時運動，也有助於從愛鄉之情進一步培養出愛國

¹⁵² 蔡龍保，〈由森林鐵路到觀光鐵路：日治時期阿里山鐵路經營策略之轉變（1896-1945）〉，《地理學報》，第105期（2023年8月），頁103-137；洪廣冀，〈林學、資本主義與邊區統治：日治時期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的再思考〉，《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77-144；蔡佩蓉，〈從帝國森林到帝國風景：阿里山的空間生產與文化想像（1896-1937）〉（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3年）。

¹⁵³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則在1942年7月成立林業部，並於9月1日起正式接管營林所的官營伐木事業及其職員。萩野敏雄，《朝鮮、滿州、臺灣林業發達史論》（東京：財團法人林野弘濟會，1965年），頁488。

¹⁵⁴ 例如1941年7月11日花蓮教育會舉辦的新高登山活動。〈新高登山花蓮港隊けさ出發〉，《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7月11日，版4。

¹⁵⁵ 作者不詳，〈夏山大登山計畫〉，《臺灣山岳彙報》，第13卷第6期（1941年6月），頁4；作者不詳，〈夏山大登山計畫〉，《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6期（1942年6月），頁3-4；作者不詳，〈夏山大登山計畫〉，《臺灣山岳彙報》，第15卷第6期（1943年7月），頁5。

精神），其重要性因而提升。這項特色所帶來的優勢，更在接下來的厚生綠地計畫中展現出來。

1943年，日本國立公園協會改組為「國土健民會」，國家公園亦在成為「國民鍊成之新道場」的新理念下往前邁進。¹⁵⁶ 與之同時，「健民地」的概念也被同步推展至朝鮮和臺灣。是年，日本政府在其國土計畫中正式提出「厚生綠地」的構想。所謂「國土計畫」，是日本企劃院自1940年4月起，以滿洲國國務院制定的「綜合立地計畫」為基礎所訂定的綜合性國土發展計畫。1940年9月，企劃院公布「國土計畫設定要綱」，其擬以日滿支（日本、滿洲國、中國）為中心、強化國防國家為目標，針對產業、交通、文化等與土地有關的各種設施以及人口分配計畫，訂定保全、利用與開發國土的綜合計畫。其中，「綜合人口分配計畫」之下即包含「文化厚生設施計畫」，¹⁵⁷ 而1943年推動的「厚生綠地」正屬於其中一環。至於「厚生綠地」的構想，政府在1940年已經開始落實。當時，日本政府為因應都市防空需求、改善國民體格、推動厚生運動，並實施地方和國土計畫等，開始著手規劃全國性的綠地建設。¹⁵⁸ 其目的在使國民能隨時隨地在都市周圍的綠地訓練身心，並藉此凝聚集體國民意識。此一概念，與前述的「健民地」概念幾乎如出一轍。

1943年，日本即著手規劃將朝鮮和臺灣的國立公園納入「厚生綠地」計畫之中，並預計在將來進一步設置縣立、道立、州立公園和都市公園，使民眾能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都有空間可以鍛鍊身心。除了公園以外，日本也計畫將其他適合的地方納入厚生綠地中，當中又以具備住宿條件的大型綠地為重，其面積最廣，與人民的居住地相對遙遠。就臺灣而言，當時的國立公園恰好符合厚生綠地中「適

¹⁵⁶ 〈健民修鍊、国立公園、日本厚生協会〉，收錄於「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2024/05/31點閱）。

¹⁵⁷ 〈國土計畫設定要綱〉，收錄於「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2024/05/31點閱）。

¹⁵⁸ 詳見關口鏌太郎，〈厚生綠地の計畫〉，《造園研究》，第33期（1940年8月），頁1-74；江間鴻二，〈時局下に於ける公園の一使命〉，《造園研究》，第33期（1940年8月），頁75-87。

合住宿的綠地」的條件，因而無須另行劃設。¹⁵⁹ 在此背景下，臺灣總督府配合展開相關規劃，預定以都市綠化為目標，指定大屯山群及臺北市東南側山岳為登山健行路線，試圖規劃出一座「理想的大臺北」。¹⁶⁰ 由此可知，自1941年起，臺灣的國立公園已在日本國土計畫的指導下，被重新定位為能隨時供人民從事運動、鍛鍊身心之用的「健民地」。

然而，隨著戰爭日益白熱化，登山活動也逐漸減少。1943年12月26日，萬華登山會舉辦的觀音山健行活動，成為《臺灣日日新報》所見關於攀登大屯山群的最後一則報導。¹⁶¹ 進入1944年後，日本不僅在大屯山地區修築戰備道路，¹⁶² 更動員學生協助構築要塞，¹⁶³ 使大屯國立公園逐漸轉變成軍事要地，厚生綠地計畫難以實現，無疾而終。

陸、結論

1910年代，日本開始倡議設立國立公園。受到明治時期以來強調山岳「雄壯」、「高大」等風景論述的影響，日本政府選擇具備「大風景」特色的地區作為國立公園。日本成功設立國立公園後，臺灣也在1930年代興起籌設國立公園的風氣。其中，相較於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這類呈現男性陽剛特質的「大風景」，大屯山群則以「纖細工法」所切割出的、較具女性形象的景觀特色引發討

¹⁵⁹ 〈国土計画中厚生緑地に関する策定事項〉，收錄於「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2024/05/31點閱）。

¹⁶⁰ 〈國土計畫に即應する「理想の大臺北」案／綠地〉，《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4月9日，版3。

¹⁶¹ 〈登山と遠足〉，《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2月24日，夕刊版2。

¹⁶² 詳情可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收錄的1944年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航照修正版），可以看到竹子湖到頂八煙新修了一條戰備道路。「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2024/06/28點閱）；另可參見黃同弘，《反轉戰爭之眼：從美軍舊航照解讀臺灣地景脈絡》（臺北：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頁126-127。

¹⁶³ 竹內昭太郎著，林芬蓉譯，《永遠的臺灣島：一九四五年，舊制臺北高校生眼中敗戰的臺北》（臺北：蓋亞文化有限公司，2022年），頁73-184。

論與爭議。支持者主張，大屯山群擁有火山地形、良好的俯瞰視野，且離都會區近；反對者則批評大屯山群規模狹小、山勢禿瘠、景緻平凡，不僅缺乏南國風情與高山、溪谷等原始山林的氣氛，也欠缺林泉之美，其周圍地區亦過於俗化與墮落，不足以讓有見識的人駐足停留。

即便有如此爭議，但在財政局長岡田信等人的奔走下，先是成功將大屯山群列入國立公園的候補地之一，接著更推動其正式設立為國立公園。臺灣總督府在行政推動上發揮了積極作用。若說中央由臺灣總督府主導，地方則有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協助推動。成立於1934年的大屯國立公園協會，是一個由實業家、官員和學者組成的官民協力組織，主要任務是宣傳與推廣大屯國立公園的風景價值，以反駁其景觀「貧弱」的負面評價。進入戰時體制後，該協會與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相互配合宣傳，並因應內務局對國立公園所賦予的新使命，在原本的觀光功能之外，更加入提升國民體能與振興國民精神的國策目標。兩協會透過博物學調查、宣傳活動及興建基礎設施來吸引人潮。其中，1940年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發起櫻花種植計畫，便是一例：這項活動不僅旨在將大屯國立公園打造成觀光勝地，也試圖將其轉化為一處可訓練人民身心的場所，體現觀光與國策功能的雙重結合。

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旗幟下，加上大屯國立公園與臺灣國立公園協會的積極推廣，自1937年起，大屯國立公園興起一波登山熱潮，並帶動當地溫泉產業的蓬勃發展。隨著戰局於1940年代日趨白熱化，國家對人力與體能的需求更加迫切。為此，自1941年起，日本重新規劃國立公園制度，轉向設立便於國民就近利用、可作為身心鍛鍊場域的國立公園。臺灣的國立公園體系也隨之調整，使大屯國立公園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例證之一。1941年在因「島都計畫」和「新體制健行」的雙重推動下，再度掀起一波登山熱。其中，園內推行的「厚生登山」和「鍊成登山」分別實踐了國立公園的兩大核心使命：「振興國民精神」與「提升國民體能」。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青少年也被廣泛動員進入國立公園，透過登山活動鍛鍊身心。至此，大屯國立公園已經澈底褪去原有的觀光色彩，轉型為一處以訓練身心為核心目的的國策實踐場域。

此際，雖然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也有相同的發展趨勢，但與大屯國立公園相比，前往登山的群體未必來自鄰近地區。換言之，大屯國立公園較符合日本當局

對國立公園「親近性」的新要求。到了戰爭後期，這項「親近性」的特質成為實質的優勢，並於隨後推動的厚生綠地計畫中展現出來。1943年，日本將「健民地」概念同步推展至殖民地，開始在臺灣規劃厚生綠地。因應國土計畫，臺灣總督府也以都市綠化為目標，指定大屯山群及臺北東南山岳為登山健行路線，試圖擘劃出一個「理想的大臺北」。然而，隨著戰爭進入末期，大屯國立公園逐步轉變成軍事要地，厚生綠地計畫也因此停滯，最終難以實現。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臺灣總督府（官）報》（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昭和10年10月臺灣總督府報第2507期〉。
〈昭和16年4月臺灣總督府報第4157期〉。
- 《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庫補助永久保存書類》（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昭和十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二卷地方〉。
〈昭和十二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卷地方〉。
〈昭和十二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四十三卷〉。
〈昭和十三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七卷地方〉。
〈昭和十三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三卷地方〉。
〈昭和十三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四卷地方〉。
〈昭和十四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十七卷地方〉。
〈昭和十四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三卷地方〉。
〈昭和十五年國庫補助永久保存第五卷地方〉。
-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昭和十五年元在官職者履歷書其一〉。
-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大正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十卷甲秘書〉。

二、報紙

-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1943年。

三、專書

- 下澤伊八郎編纂，《大屯火山彙植物誌》。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1年。
丸山宏，《近代日本公園史の研究》。東京：思文閣，1995年。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大屯山彙：國立公園候補地》。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

- 會，1935年。
- 大屯國立公園協會編，《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大屯國立公園內櫻植栽報告》。臺北：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43年。
- 大橋準一郎，《森林學大意》。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6年。
- 中村不羈兒，《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二年度》。臺北：臺北州方面委員聯合會，1939年。
- 中村不羈兒，《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三年度》。臺北：臺北州方面委員聯合會，1939年。
- 出口雄三編纂，《大屯火山彙地質調查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2年。
- 田中正大，《日本の自然公園：自然保護と風景保護》。東京：相模書房，1981年。
- 矢津昌永，《地理學小品》。東京：民友社，1902年。
- 石川真澄，《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五年度》。臺北：臺北州方面委員聯合會，1941年。
- 竹內昭太郎著，林芬蓉譯，《永遠的臺灣島：一九四五年，舊制臺北高校生眼中敗戰的臺北》。臺北：蓋亞文化有限公司，2022年。
- 西田正憲編著，《国立公園と風景の政治学》。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21年。
- 李瑞宗主編，《尖帽峽：陽明山國家公園譯文集》。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0年。
- 村串仁三郎，《国立公園史の成立：開發と自然保護の確執を中心に》。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5年。
- 谷河梅人編，《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臺北：臺灣山岳會，1944年。
- 岡田紅陽攝影，長崎浩編輯，《臺灣國立公園寫真集》。臺北：臺灣國立公園協會，1939年。
-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6年。
- 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臺灣登山小史》。臺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
- 宮田聖子著，郭婷玉譯，《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
- 脇水鐵五郎，《日本の風土・支那の風土》。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41年。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臺北：衛城出版社，2015年。

許佩賢主持，《109-110年陽明公園及其周邊日治時期人文歷史調查委託辦理案》。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21年。

野村幸一，《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

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臺北：臺灣博覽會，1939年。

曾山毅，《植民地臺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年。

黃同弘，《反轉戰爭之眼：從美軍舊航照解讀臺灣地景脈絡》。臺北：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黃雯娟，《陽明山地區地名探源與調查報告》，臺北：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年。

萩野敏雄，《朝鮮、滿州、臺灣林業發達史論》。東京：財團法人林野弘濟會，1965年。

葉柏強，《顧我洄瀾：花蓮歷史影像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4年。

臺北市役所，《臺北都市計畫地域設定說明書》。臺北：臺北市役所，1941年。

臺北州，《大屯山彙ト國立公園》。臺北：臺北州，1934年。

臺北州，《臺北州社會事業概要 昭和十年度》。臺北：臺北州，1935年。

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大屯國立公園協會規約及會員名簿》。臺北：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大屯國立公園協會，1938年。

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編，《第一回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議事錄》。出版地不詳：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1936年。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大正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1922年。

臺灣總督府，《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年。

謝國興、鍾淑敏、籠谷直人編，陳進盛等譯，《茶苦來山人逸話：三好德三郎的臺灣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

四、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生，〈國立公園の指定地たるべき大屯山一帯の交通路網〉，《臺灣自動車界》，第3卷第10期（1934年10月）。

大橋準一郎，〈大屯山彙〉，《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

大橋準一郎，〈大屯山彙の四季〉，《臺灣地方行政》，第4卷第2期（1938年2

- 月）。
- 大橋準一郎，〈風景の保護と開發〉，《臺灣の山林》，第164期（1939年12月）。
- 山中樵，〈大屯の史實と史蹟〉，《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
- 山縣三郎，〈臺灣國立公園の指定に當りて〉，《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
- 中瀨拙夫，〈臺灣國立公園號の刊行に就て〉，《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
- 丹桂之助，〈大屯火山彙に發達する平坦面に就いて（豫報）〉，《臺灣地學記事》，第2卷第3期（1930年11月）。
- 丹桂之助，〈大屯國立公園附近の地形と地質〉，《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7年12月）。
- 丹桂之助，〈觀音火山の噴出期に就いて（續報）〉，《臺灣地學記事》，第5卷第2期（1934年3月）。
- 內務局土木課，〈非常時局に誕生せる臺灣の三國立公園〉，《部報》，第15期（1938年2月）。
- 日比野信一，〈臺灣の國立公園に關する吾人の意見と希望〉，《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
- 木村泰治，〈臺灣國立公園の特徴大屯山の持つ特異性〉，《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
- 出口一重，〈戰時下登山報國の一路を辿りて〉，《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3期（1942年3月）。
- 平澤龜一郎，〈戰時下の登山と國民の鍊成〉，《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1期（1942年1月）。
- 正之介，〈大屯山彙國立公園問題〉，《熱帶園藝》，第4卷第10期（1934年10月）。
- 永井浩，〈登山と國立公園〉，《國立公園》，第10卷第7期（1938年7月）。
- 田村剛，〈時局下の國立公園と新日本國立公園の提唱〉，《國立公園》，第13卷第5期（1941年9、10月）。
- 帆苅猛，〈近代風景觀の成立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志賀重昂の「日本風景論」を中心として〉，《關東学院大学人間環境研究所所報》，第4期（2006年3月）。
- 早坂一郎，〈臺灣の國立公園〉，《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26卷第251期

(1936年4月)。

早坂一郎，〈臺灣の國立公園事業に對する希望〉，《臺灣の山林》，第123期
(1936年7月)。

江間鴻二，〈時局下に於ける公園の一使命〉，《造園研究》，第33期(1940年8月)。

羽生南峰，〈臺灣觀光事業の促進を望む〉，《交通時代》，第7卷第6期(1936年6月)。

西田正憲，〈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臺灣の國立公園〉，《地域創造 研究：奈良 立大 研究季報》，第22卷第2期(2012年1月)。

西村貴裕，〈「國立公園」から「国土と健民」へ——國立公園の意義をめぐる言説の変遷(1929～1944)〉，《大阪教育大学紀要 第II部門 社会科学・生活科学》，第60卷第2期(2012年2月)。

西村貴裕，〈The “Militariza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Japan (1925-1944)〉，《大阪教育大学紀要 第II部門 社会科学・生活科学》，第65卷第1期(2016年9月)。

作者不詳，〈大屯彙山とさくらの名所〉，《臺灣運輸月報》，第93期(1942年3月)。

作者不詳，〈夏山大登山計畫〉，《臺灣山岳彙報》，第13卷第6期(1941年6月)。

作者不詳，〈夏山大登山計畫〉，《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6期(1942年6月)。

作者不詳，〈夏山大登山計畫〉，《臺灣山岳彙報》，第15卷第6期(1943年7月)。

作者不詳，〈國立公園協會第十回總會に際して〉，《國立公園》，第13卷第3期(1941年6月)。

作者不詳，〈新に指定を見た臺灣三大國立公園の全貌(三) 本島唯一の火成岩系山岳美を誇る 大屯國立公園〉，《旅と運輸》，第9期(1938年3月)。

作者不詳，〈臺北州青年團幹部の登山指導〉，《臺灣山岳彙報》，第13卷第10期(1941年10月1日)。

作者不詳，〈臺灣の大屯〉，《臺灣藝術新報》，第5卷第1期(1939年1月)。

作者不詳，〈編輯後記〉，《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

作者不詳，〈鍊成登山鳶嘴山行(第155回)〉，《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3期(1942年3月)。

- 谷河梅人，〈夢の大屯山國立公園〉，《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
- 岡田紅陽，〈臺灣の山岳美・溪谷美〉，《臺灣山岳》，第10期（1939年3月）。
- 服部武彦、國府健次、山本重吉，〈火山後期作用による安山岩の腐蝕分解の一適例〉，《臺灣地學記事》，第5卷第8期（1934年7月）。
- 沼井鐵太郎，〈臺灣國立公園候補地の山谷を截る〉，《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
- 洪廣冀，〈林學、資本主義與邊區統治：日治時期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的再思考〉，《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2期（2004年12月）。
- 徐聖凱，〈日治後期臺灣的娛樂管制、社會調節與民眾應對〉，《新史學》，第32卷第3期（2021年9月）。
- 神田孝治，〈日本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大屯国立公園の指定と地域〉，收入陳俊強、洪健榮主編，《臺北州建州百年：在地化與國際化的視角》。新北：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2021年。
- 神田孝治，〈日本統治期臺灣における国立公園の風景地選定と心象地理〉，《歷史地理學》，第53卷第3期（2011年6月）。
- 荒山正彦，〈明治期における風景の受容——「日本風景論」と山岳〉，《人文地理》，第41卷第6期（1989年12月）。
- 國府健次，〈大屯山彙の溫泉〉，《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7年12月），頁36-40。
- 國府健次、山下一男，〈大屯火山彙に關する地質化學的研究（II）七星山及びその附近に於ける安山岩に就いての地質化學的研究〉，《臺灣地學記事》，第3卷第2期（1932年2月）。
- 曾山毅，〈臺灣八景と植民地臺灣の觀光〉，《立教大學觀光學部紀要》，第5期（2003年3月）。
- 細川護立，〈皇紀二千六百年を迎へて〉，《國立公園》，第12卷第1期（1940年1月）。
- 鳥居敬造，〈地形及地質構造より見たる國立公園の概觀〉，《臺灣の山林》，第123期（1936年7月）。
- 蔡家丘，〈江山洵美是吾鄉——丸山晚霞與東亞山岳圖像的意涵〉，《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7期（2014年9月）。
- 蔡惠頻，〈從「草山」到「陽明山」：一個地景文化意涵的演變歷程〉，《白沙

歷史地理學報》，第8期（2009年10月）。

蔡龍保，〈由森林鐵路到觀光鐵路：日治時期阿里山鐵路經營策略之轉變（1896-1945）〉，《地理學報》，第105期（2023年8月）。

蔡龍保，〈由觀光活動到觀光產業：日治時期臺灣觀光產業化過程之探析〉，「臺灣歷史上的家族、社會與國家暨許雪姬特聘研究員榮退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年9月21-23日。

齋藤齋，〈大屯火山暈の地質に就て〉，《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7年12月）。

顏杏如，〈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植櫻與櫻花意象：「內地」風景的發現、移植與櫻花論述〉，《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3期（2007年9月）。

藤田 治郎，〈臺灣國立公園の誕生に當りて〉，《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

關口鋈太，〈厚生綠地の計畫〉，《造園研究》，第33期（1940年8月）。

關文彥，〈國立公園は産業を沮害するか否人爲も亦自然なり〉，《國立公園》，第10卷第1期（1938年1月）。

五、學位論文

吳兆宗，〈昭和2年臺灣八景募集活動及其影響〉。彰化：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坂井洋，〈「泡」在臺灣——臺灣溫泉的發展與泡澡行為之變遷〉。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年。

唐伯良，〈日治時期臺灣國立公園的設置與角色賦與〉。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

蔡佩蓉，〈從帝國森林到帝國風景：阿里山的空間生產與文化想像（1896-1937）〉。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3年。

六、網路資料

〈国土計画中厚生緑地に関する策定事項〉，收錄於「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2024/05/31點閱）。

〈健民修鍊、国立公園、日本厚生協会〉，收錄於「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2024/05/31點閱）。

〈国土計畫設定要綱〉，收錄於「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2024/05/31點閱）。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2024/06/28點閱）

田健治郎，《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8月21日），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24/12/16點閱）

田健治郎，《田健治郎日記》（1920年8月22日），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24/12/16點閱）。

附錄：〈大屯國立公園協會規約〉

- 第 一 條 本會稱為大屯國立公園協會，事務所設於臺北州廳內。
- 第 二 條 本會謀求將大屯山群及其附近一帶之景勝地推動設立為國立公園，並試圖以將之努力達成為目的。
- 第 三 條 本會為了達成前條之目的，擬進行如左之事業：
- 一、注意謀求增進設施。
 - 二、試圖保護擁有本山群之自然。
 - 三、宣傳及介紹。
 - 四、舉行視察觀光會。
 - 五、進行關於設備設施等研究調查。
 - 六、與其他有相同目的的團體聯絡。
 - 七、進行其他達成本會目的之必要事業。
- 第 四 條 本會會員分成名譽會員、普通會員和團體會員：
- 一、名譽會員是會長從對本會有功勞或有學識經驗者中推舉之。
 - 二、普通會員是贊同本會宗旨且對該事業有貢獻之居住於本島者。
 - 三、團體會員是贊同本會宗旨且對該事業有貢獻之團體。
- 試圖成為會員者應登記住所、姓名及其職業後向本會提出申請。
- 第 五 條 本會經費由捐贈金、補助金及其他收入權充之。
- 第 六 條 本會設置如左之幹部：
- 會長 一名。
 - 副會長 二名。
 - 理事 若干名（內含若干名常務理事）。
 - 評議員 若干名。
- 第 七 條 會長代表本會總理會務，並擔任會議議長。
- 副會長輔佐會長，若會長突有事故，由其代理職務。
 - 理事掌理會務。
 - 評議員組成評議員會，審議重要事項，並接受會長質詢。
- 第 八 條 本會設置名譽會長。
- 名譽會長推載臺北州知事。

第 九 條 本會設置顧問，擬由會長推舉具學識經驗且居於本島者。

第 十 條 會長、副會長在理事會中推舉之。

理事由會長從評議員中委任之。

評議員由會長從會員中委任之。

第十一條 本會設立書記以處理庶務。

第十二條 本會會計年度始於四月一日，終於隔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十三條 除了本規約所定之條例外，必要事項經理事會議後，由會長訂定。

副則

本會會長、副會長由臺北知事指名擔任之。

